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29期

【思想文化】

各国的“小毛泽东”/延曦

——《红潮小史》启示录之五

【百年国史】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金光耀 张宁

——江西省接受上海知青的考察（下）

【评论】

文革词汇随想/唐燕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0）/李南央（美）

——回顾与前瞻

【序跋】

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升华——刘海鸥《画说我的一生》序二/忆陵

《北京大学文革研究文选》编者按/胡宗式 章铎 编

【述往】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三）/杜钧福

【书讯】

罗征启著《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记》在美出版

赵品华著长篇小说《梅花劫》在美出版

【资料】

关于革命领导干部吕应中同志材料汇编（1967.11）

清华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正确对待干部》战斗组

【补白】

黎澍谈“兴无灭资”/李锐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各国的“小毛泽东”

——《红潮小史》启示录之五

延曦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国的毛泽东一出，便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于是许多国家跟着出了一个个“小毛泽东”。

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

印度共产党以查鲁·马祖达为首，称“印共（马列）”。他称颂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范围全面胜利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见《印度怎样斗地主和搞文革？》）马祖达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正准备成为“印度的毛泽东”。

利比亚卡扎菲有一本“小绿书”——即他的语录，成为仅次于《古兰经》的指导思想。根据他的思想，利比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各地群众起来造反，罢免政府官员，逮捕了数以万计的官员。卡扎菲甚至解散政府，用人民大会来取代。他要砸烂旧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为本国乃至全人类创造出一个新制度。（见《卡扎菲的“小绿书”》）

加纳的恩克鲁玛在国内用暴力推行共产主义，终于激起反抗。推翻他的军政府文告说：“对于恩克鲁玛来说，加纳的独立就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他的个人喜好任意行事。他处心积虑地建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无所不能。他相信自己成了上帝。”（见《恩克鲁玛失去政权的教训》）

秘鲁共产党中有个毛派“光辉道路”，其主席叫冈扎洛，真名叫古兹曼，此外他在党内还有一个称号，在印第安人语言中就是“红太阳”之意。

80年初，当中国不但结束了文革，而且开始了改革开放时，秘鲁首都利马的大街上，几条死狗被头朝下吊在树干下，血淋淋的身上贴着纸条，上面用西班牙文写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邓小平。与此同时，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受到炸弹和手榴弹的袭击。暗杀，袭击警察局，破坏选举站等暴力行动在秘鲁的城乡频繁地发生，“人民战争”的传单在大街小巷雪片一般飞舞。

如此仇视主张改革的中国领导人的就是原来的那个秘鲁共产党的极端派别“光辉道路”，然而，这个已经堕落为暴力恐怖集团的头子原先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哲学教授，正是在中国“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世界革命的火炬传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从哲学教授到恐怖分子》）

说起来很好笑，就连非洲刚果那个以反共闻名的蒙博托都跑到北京来向毛学习，毛亲自接见了这个家伙，还夸奖他勇敢善战，把毛自己支持的毛派游击队打得“呜呼哀哉”。蒙博托很崇拜毛，回国后就大搞有扎伊尔特色的个人崇拜，还把独立后一段时间内在西方影响下建立起来的40多个政党全部解散，只留下他的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控制政权，然后依靠垄断国家权力为私人和小集团疯狂聚敛财富。（《蒙博托的“盗贼政权”》）

《红潮小史》作者总结说：“盗贼政权”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词汇，这个词汇的产生和流行，起初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蒙博托为代表的非洲独裁腐败政权的描绘，后来也用来指称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政权，例如菲律宾的马科斯。

最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新加坡华人很多，由于中国文革影响，一些华人青年人也上街闹事，于是李光耀“公开严厉”地批评这些幼稚的左翼分子为新加坡的“小毛泽东”。☞

【补白】

黎澍谈“兴无灭资”

黎澍认为这是一个彻底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提这个口号的人连《共产党宣言》都没读过。很可能还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脱胎而来。《宣言》说：“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了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所谓“兴无灭资”岂不是大笑话！至于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抗中各自发生的变化，社会主义大弯路，资本主义大发展，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能预料得到？（李锐）——黎澍纪念文集编辑组 编《黎澍十年祭》第32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百年国史】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江西省接受上海知青的考察（下）

金光耀 张宁

内容提要：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基层干部和农民因知青下乡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种种担忧与顾虑，尤以工分问题最为显著。面对裹着各种口号的政治任务，农民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本篇依据档案、知青日记和口述访谈等史料，通过江西省接受上海知青的具体事例，讨论农民与知青的关系，以及农民对国家政策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应对。

关键词：知识青年 农民 工分 同工同酬

三、工分的矛盾

知青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参与评工分的方式进入到生产队的日常运作之中，这就意味着要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分得一杯羹。在整个生产和生活资源还不富足的环境制约下，这就会引起农民的紧张、不满甚至对立，尤其在那些土地资源原本就不宽裕而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地方。因此，工分问题集中体现了农民对知青的态度，也成为他们之间矛盾的一个焦点。

从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中央就强调“一定做到同工同酬”¹，江西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在1969年就硬性规定下乡青年工分不得低于5分，一些县的领导在知青刚下乡时也下达了这一规定：知青工分女的不低于5分，男的不低于6分，并强调“在工分上卡实际上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不理解”。²各级政府是将“同工同酬”作为落实上山下乡政策的政治任务向下布置并督促执行

¹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1970年5月，出自：宋永毅，2014。

² 《专区精办传达省革委程世清同志指示》，1969年8月16日，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89-18-1。《金溪县各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上海护送干部联席会议记录》，1970年4月22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271

的，而农民则是从日常生活的逻辑看待这一问题的。这一差异导致在实际生活中“同工同酬”很难推行下去。1969年3月到永丰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插队的夏建丰在5月迎来第一次评工分，他自忖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按自己栽禾的速度和质量，一天至少可以拿8个工分。但生产队长一句话就定了乾坤，结果女知青4分，男知青4.4分，夏建丰因为表现好，且在知青中年岁最大，评了最高的4.5分。而同村的男劳力都在10分以上。³

在新干县云庄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似乎比先锋大队的上海知青命运稍好一些。1968年12月底知青下乡一个月后第一次评工分，王宗仁和另一位一起在村中画毛主席像和写标语的知青评了6分，是知青中的最高分，其他知青在3.5分到5.5分之间。但第二年春天，王宗仁因为插秧技术不好，工分被减到5.5分，而一次减去0.5分在当地被看作是严重的惩罚。到了秋季，为了落实“同工同酬”的政策，公社主任专门来到云庄大队办学习班，在其压阵下才将知青的低工分全部调整到5分。⁴

知青工分偏低是江西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女知青的情况更为严重。例如1971年，乐安县有735名男知青，工分不到7分者有一半，695名女知青5分以下者占60%；永丰县藤田公社940名知青，5分以下者有590名，占63%，而423名女知青中5分以下者达98%，其中3.5分以下的有55人。⁵波阳县1179名女知青中，4分及以下者291人，占25%，4.1分到5分的596人，占一半。而在1264名男知青中，7分以下的651人，超过了一半，7.1分到8分的498人，占39.4%，9.1分以上只有11人，不到1%。⁶婺源县许村公社一些已经下乡五六年的知青，到了1974年工分底分仍然是5~6分。⁷新余县水北公社17名知青，工分最高6.7分，最低5分，平均不到5.5分。该县南港公社一个知青工分底分1970年为5.6分，1971年为6分，1972年5.8分，1973年又降为5.6分。⁸

³ 夏建丰，2015：382-383

⁴ 《王宗仁日记》，1968年12月24日、1969年7月15日、1969年10月2日。

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省学习慰问团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1972年12月1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75

⁶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学习慰问团上饶分团，《在波阳学习慰问的情况汇报》，1972年7月，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22

⁷ 婺源县革委会知青办、上海赴婺源慰问小组，《许村公社党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提高知识青年生活自给程度的调查报告》，1974年12月10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88

⁸ 新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73年8月4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19

新干县地处井冈山地区，丘陵山地较多，总体上能够容纳新的劳动力，历来为移民接收县。20世纪60年代先后成建制地接受安置了湖南、浙江等地移民，但这里的农民也不能对知青做到“同工同酬”。乐安县招携公社也是劳动力不足的地方，部分副业要去请湖南、浙江的外来人口做。该公社接受了280多名上海知青，在最初的欢迎之后，日子一久，农民就对知青冷淡疏远了，认为“他们来是添麻烦，增加负担”。⁹潘鸣啸认为土地与人口的比例高低是影响农民对知青欢迎程度的主要因素。¹⁰但上述事例表明即使土地相对宽裕劳动力相对不足的生产队，农民也不愿意接纳知青。在有些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地方，生产队就更担心知青与农民争工分。一些生产队会在出工时间、天数、工种方面对知青加以各种限制。宜黄县东陂公社有些生产队为了不让知青出工，给他们放假三天，有的生产队则让知青干既难做、分值又低的工作。新余县南港公社农民说，不用让知青做很多工分，只要做到口粮工分就行了，他们穿的用的反正上海家里有钱寄来。¹¹清江县黄岗公社的两名知青，劳动底分一直不高，主要是不会犁耙，他们提出要学犁耙，生产队不同意，说会搞坏犁，只让他们干硬活、笨活。¹²

知青们对辛勤劳动挣来的工分被压低非常不满，一个知青说：“我年纪这么大，个子这么高，工分还不如一个放牛娃，我懒得做事啦。”云庄大队的知青则聚集起来向大队提出要实行“同工同酬”，重评工分。¹³对知青提高工分的要求，农民的回答是：“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来争工分的。”¹⁴农民虽不太懂政治，也不太关心政治，但他们懂得利用政治话语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有时候农民扣压工分也有他们自己的道理。知青到农村后，一些积极分子经常会参加会议或学习班，按规定生产队要给这些参加会议和学习班的知青记工分。

⁹ 上海慰问团三、四组，《关于知识青年在用完安置费后能否自给的问题》，1969年9月，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35、439

¹⁰ 【法】潘鸣啸，2009：334

¹¹ 宜黄县革委“五·七”办公室，《关于当前我县下乡知识青年情况的汇报》，1972年5月26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0。新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73年8月4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19

¹² 清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传达贯彻中央21号文件和毛主席复信，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大检查情况汇报》，1973年7月26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08

¹³ 《王宗仁日记》，1970年9月7-9日、11、13日。

¹⁴ 湖口县革委会办公室，《关于城镇下放居民和知识青年安置情况的调查报告》，1972年1月15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上册，183

这些没有产生实际工效的“政治工分”自然就要平摊到生产队每个人头上，农民当然要抱怨“办学习班要记工”，增加了他们的负担。¹⁵

除了压低知青的工分，拖延兑现知青有限的工分收入的情况也不鲜见。永丰县有些知青，1969年的劳动收入到1972年尚未兑现。湖口县流芳公社红山林场插队的知青，1970年的劳动收入只发了一年的生活费，其余的则拖延不发。有上海知青断粮三天，到处借米度日，生产队长却说：“要粮拿钱到粮站买回供粮，队里口粮不多。”¹⁶宜黄县二都公社三都大队的知青赤脚医生，1970年和1971年两年劳动收入400多元，但一分钱都没有领到，只得去借钱吃饭。黄陂公社友谊大队的几个上海知青1971年的劳动收入到1972年5月还没兑现。¹⁷定南县的上海知青一年收入80元，但只能兑现一半。修水县有知青兄妹三人，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年终分红可得500元，却只拿到80多元。而生产队压低知青工分和拖延兑现的理由是：“反正你们上海人有钱”，“上海人有钞票，超支不要紧”，“你们知识青年只要花八分钱邮票，寄封信回上海就有钱来”。¹⁸在自留地的分配方面，一些地方也出现排斥知青的现象，如新余县某生产队当地农民分自留地1.7分，而知青只有0.5分，不到农民的三分之一。¹⁹

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江西各级政府将“同工同酬”作为加强和改进知青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上海知青的工分问题进行调研并要求改正，同工不同酬现象有所改观。例如，于都县罗坳公社每年对知青劳动底分进行一次调整，1974年全公社女知青底分不低于7.5分，男知青底分不低于8.5分。²⁰井冈山吉水县水南公社山下大队的15名上海知青，男知青的劳动底分普遍为10分，女知青也被评到8分，一年下来能收入二三百元。²¹新干县的干部也下到云庄大队去督促

¹⁵ 《金溪县各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上海护送干部联席会议记录》，1970年4月22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273

¹⁶ 湖口县革委会办公室，《关于城镇下放居民和知识青年安置情况的调查报告》，1972年1月15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上册，181

¹⁷ 宜黄县革委“五·七”办公室，《关于当前我县下乡知识青年情况的汇报》，1972年5月26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0

¹⁸ 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调查情况汇报》，1974年7月21日；上海学习慰问团九江分团，《关于五个月来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1974年8月19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47、410。会昌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几个问题的情况汇报》，1973年8月6日，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89-8-23。

¹⁹ 新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73年8月4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22

²⁰ 于都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代表大会秘书组印，《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再教育工作（罗坳公社党委）》，1974年6月14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68-369

²¹ 吉水县水南公社山下大队党支部，《为革命勇挑再教育重担》，1974年10月，出自：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编，2004：131

执行。作为县知青办副主任，刘璧瑛做过许多帮助知青争工分的事，他对生产队干部和农民反复强调的是，如果知青吃不饱，他们就不能安心待在农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你把他们赶回上海去了，要找你算账的。”生产队干部一听此话，只能就范。²²

农民与知青在工分问题上的矛盾多发生于知青下乡初期，矛盾的缓和除了政府的重视外，当地农民与知青有一个逐渐接纳、增进理解的过程，知青也有一个对农活逐渐掌握的过程。待知青完全掌握农活甚至比一般农民干得更好时，在很多地方农民也会给予他们应得的工分。新干县云庄大队知青桂修铭在下乡的最初两三年，不熟悉农活，工分很低，生活完全不能自给。等适应了农村生活与劳动后，生产队给他评了十个工分，后来他一年的收入按月计算要高于当时上海青工每月36块钱的工资。他返回上海后结婚的费用就是用在农村挣的钱。²³峡江县坑里村知青汪泽峰1968年下乡，1970年便在农村组建家庭，1972年孩子出生，也是靠自己挣工分养活一家人的。²⁴

四、农民的态度

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在普遍贫困、物资短缺的时代背景下，知青在农村的处境与农民欢迎不欢迎直接相关。江西农民对上海知青的帮助与照顾、上海知青为农村做出的贡献，尤其是知青参加农业科学实验、农村建设与管理，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当年的宣传材料和近年各地官方与知青编纂的文集有较多的记录和肯定的评价。²⁵但是另一方面，大量档案资料呈现出基层干部、农民与知青在工分、住房、物质分配、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来自农村的种种“不欢迎”现象是上海慰问团和江西各级政府许多调查报告中的重点内容，这些材料揭示了政治宣传话语背后隐藏的民众心态，以及基层干部、农民与知青的复杂关系。

基层干部与农民都明白知青是奉毛主席之命下乡，他们在“北京有个爷”。而依据以往政治运动经验得出的“知识青年待不长”的判断，成为基层干部与农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遍认识。在知青大规模下乡前及下乡过程中，江西有许多

²² 对刘璧瑛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5日。

²³ 对桂修铭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1日、2019年5月3日，上海市。

²⁴ 对汪泽峰、吴昌健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5日，江西省峡江县。

²⁵ 例如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2004；江西省吉安市党史办编，2004；新干县档案局编印，2013

城市干部下放农村，但待了不长时间就陆续回城，更强化了这一认识。有些基层干部和农民希望上海知青能像下放干部一样在生产队劳动，但不参加工分分配。在江西山区的很多村子，工分值只有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农民处于普遍贫困的状态，自顾不暇更遑论持续帮助上海知青。他们将知青看成临时客人，一些颇为形象的话语如“知识青年是毛主席的崽”“上海阿拉是屋檐下的躲雨客”在各地农村流传。因此，除了按要求完成欢迎知青的政治任务外，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并没有真正做好接受知青的准备。永丰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的农民放鞭炮将知青迎进了村，但安置的具体工作却没有头绪，以致上海带队来的工宣队非常不满，要去公社进行交涉。有的生产队干部在知青进村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要住多长时间，要走可以帮助送走，还说要解决锅灶等实际问题，那就拿一千元来，结果弄得刚下乡的知青心神不定，第二天一早就换到别的村子去了。²⁶会昌县洞口公社在组织农民去欢迎知青后，用安置经费给完成任务的农民发误工费，将欢迎看作是额外负担。²⁷

在政治态度方面，农民与知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毛泽东指示中赋予农民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崇高职责，但他们对于官方所赋予的导师角色并无兴趣，称上海知青“是从大城市来的，有文化、有知识，能说会道，还要我们教育他什么？”²⁸农民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穿衣吃饭等实际问题。知青中的一些人经受了文革的洗礼，对政治充满热情，到了农村后要整天劳动，围着田头、灶头转，看不到报纸，政治学习少了，担心这样下去会变成“政治上的盲人”。²⁹有些知青刚下乡还带着红卫兵的习气。1968年秋，一批上海知青自行来到井冈山厦坪公社联系插队落户。他们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高喊“改造农村”的政治口号，结果没几天就被当地农民客气地送走了。³⁰永丰县里陂上村的知青想在当地农民面前显示下自己的政治优势，刚进村就问：“你们知道张春桥吗？他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是我们上海的。”结果，农民们一脸茫然，根本不知道张春桥是

²⁶ 夏建丰，2015：15。《金溪县各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上海护送干部联席会议记录》，1970年4月22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276

²⁷ 会昌县革命委员会“五·七”大军办公室，《关于下乡上山安置经费清理情况的报告》，1971年1月7日，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89-6-15。

²⁸ 定南县上山下乡工作调查组，《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知识青年茁壮成长》，1972年7月30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70

²⁹ 新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73年8月4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18-319

³⁰ 王宗仁，《“不欢迎”与“应当欢迎”——由一段回忆录引出的思考》（未刊稿）。

谁。³¹有些知青习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对农村里的很多风俗习惯和包工包干的现象进行斗争与举报，引发了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反感。这是农民生活逻辑的自然反应，他们对政治没有城里人那样的兴趣。这使有些知青认为贫下中农非但“不革命”，反而是愚昧、狭隘、自私的象征。

江西农村如同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一样闭塞、贫穷，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与农民没有到过大城市，他们对于上海的认知只能在“想象的层面”上。农民要么认为知青来自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父母都是拿国家工资的人，家里肯定很有钱，如前所述，一些生产队压低知青工分和拖延兑现的理由就是“反正你们上海人有钱”，“上海人有钞票，超支不要紧”；要么以农村的情况来推测上海的状况。峡江县江背公社江背大队的回乡知青陈禄根与上海知青聊天，就曾问过这样一句话：“过年你们家杀猪了吗？”新干县璜陂村全村80多户人家，只有两个人看到过火车，七八个人到过县城。³²由此在生活习惯上存在着很大差异。有上海知青一进村就问公共厕所在哪里，抱怨没有卫生纸，基层干部对此很不适应。

33

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及自身利益的不同，公社体制下的各级基层干部对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与做法并不一样。公社干部属于城镇户口，由上级任命，拿国家工资，他们要对上负责，全力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并应付检查，政治落实抓得紧，口号喊得响。大队干部与生产队干部则是农业户口。大队干部半脱产，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来源于参加劳动，一部分则是大队给予的各种补助，有普通农民得不到的实惠。生产队干部基本上与普通农民无异，但通常要吃苦耐劳在前，还容易得罪人，常常出力不讨好。³⁴因此，在对待知青问题上，三级干部也就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来：公社干部会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相关政策；而大队与生产队干部则会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们基本上是从本位主义出发考虑问题的，前述的工分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们对知青到农村最为关注的就是本队的经济利益是否受损，即使在那些相对缺乏劳动力的地方，生产队长也会担心知青劳动力不强，会增加本队的负担。

³¹ 夏建丰，2015：11

³² 对陈禄根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1日，上海市。新干县档案局编，2013：7、15-16

³³ 《金溪县各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上海护送干部联席会议记录》，1970年4月22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279、282

³⁴ 参见刘小萌，1998：458

农村基层干部是知青直接面对的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天高皇帝远，前面所述一些干部捆绑吊打知青和奸污女知青就是滥用权力触犯法律的典型事例。类似事件在江西各地并不罕见。³⁵波阳县一个大队党总支副书记强奸上海女知青被揭发后，其他干部非但不依法办事，还反过来对女知青施加压力，说“培养一个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你早给我讲事情就不会闹得这么大”，“以后定案时总是要你签字的，要手下留情”，而该副书记则一直逍遥法外。³⁶

更多的是基层干部通过权力从知青那里贪小便宜，谋取私利。清江县有个生产队长看见一个知青有个好的打火机烟盒，就以借的名义拿走了，后来看到这个知青有支手电筒，又“借”走了，以后这个知青重新买了一个塑胶手电筒，又被他“借”走了。这个知青表示出不满后，他就在其他事上故意为难。³⁷新余县有个知青因为春节回上海没给生产队长买到尺寸合适的鞋子，大学招生时生产队长就不同意这个知青去。这个生产队的其他知青由此都有了沉重的思想负担，为了能买到干部、农民托买的東西，回上海时经常凌晨两、三点钟起来去排队，以便回农村时可以交账。³⁸

有些农村干部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不顺从的知青。清江县一个知青在生产队调整规模后到了邻近的一个新队，新队分给他稻草，原来生产队的支书没弄清情况就说他是偷老队的稻草，强迫他承认，知青不承认，这个支书就将知青做饭的锅砸烂了。这个县另外一个农场场长扣发知青的口粮，知青顶了几句嘴，这个场长就动手打伤了知青。³⁹会昌县城郊公社有一个生产队长，因为知青对他提了意见，就在评工分时故意压低等级。新干县云庄大队有个知青本来有机会招工，但就因为大队干部看他不顺眼，觉得“这人骄傲，容易顶撞”，结果就改换了其他人。⁴⁰

³⁵ 清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传达贯彻中央二十一号文件和毛主席复信，开展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大检查情况汇报》，1973年7月26日；上高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当前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情况汇报》；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上海赴江西学习慰问团赣州分团调查情况汇报》，1974年7月21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12；中册，392、446

³⁶ 上海市革委会赴江西省学习慰问团上饶分团，《在波阳学习慰问的情况汇报》，1972年7月，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24

³⁷ 清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传达贯彻中央二十一号文件和毛主席复信，开展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大检查情况汇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12

³⁸ 新余县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73年8月4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23

³⁹ 清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传达贯彻中央二十一号文件和毛主席复信，开展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大检查情况汇报》，1973年7月，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12

⁴⁰ 会昌县革委会“五·七”大军办公室，《关于当前“五·七”大军情况的反映和今后意见》，1971年12月14日，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89-6-11。《王宗仁日记》，1970年9月17日。

基层干部大都将知青看成是“麻烦”与“包袱”，“知青工作难做”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在很多大队与生产队干部眼里，知青“生活要人帮，劳动要人教，真是包袱越背越重”，“他们是大城市来的，在我们山沟里蹲得下来吗？”上高县界埠公社有个大队干部说：“宁愿管一千老倌，不愿管一个知识青年。”金溪县有些干部认为“大城市来的，社会经验多，问题不少，麻烦事多，不好领导”，“上海青年不好弄，不如南昌学生好弄”⁴¹。

这样的偏见使许多基层干部歧视和排挤上海知青。上高县一个大队对上海知青政治上歧视，经济上刻薄，接受了17个上海知青没有发展过一个团员。大队中一个女知青提出副队长老婆和大队会计的亲属多报、错报工分，该副队长带头对该女知青进行围攻、辱骂和威吓。该县另一个大队安排大队干部子女30多人进民办小学、合作医疗、电站、代销店等轻松而工分高的岗位，下乡知青却只安排了一个。⁴²

地方本位主义使上海知青在提拔任用、入党入团、招工、招生、参军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与排挤。1968-1972年间，在江西的十万多名上海青年中已入党的只有457名，占总人数4.5%，73个县中有14个县没有发展一个上海知青入党，有7个县只发展1名。彭泽县和团公社荆桥大队，原有九江青年和上海青年各30名，到1972年九江青年只剩下5名，而上海青年还有27名。走掉的25名九江青年中有22名是“开后门”走的。⁴³

表2. 石城县知青变动情况（截至1972年5月）

类别	总数	升学	进工厂	国家干部	参军	外迁	变动比例
上海知青	978	4	72	4	0	51	13.4%
本地知青	695	4	145	7	14	312	69.4%

⁴¹ 上高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当前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情况汇报》，1974年5月；《金溪县各公社“五·七”大军负责人上海护送干部联席会议记录》，1970年4月22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92；下册，269、272

⁴² 上高县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当前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情况汇报》，1974年5月，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92-393

⁴³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江西省学习慰问团关于学习慰问工作的情况汇报》，1972年12月1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377-378

表 3. 婺源县知青变动情况（截至 1977 年）

类别	1968 年以来人 数	调离人数	剩 余 离 人 数	变动比例
上海知青	961	516	445	54%
上饶知青	1321	1021	300	77%

如表 2 所示，石城县的上海知青人数比本地知青多，但无论是升学、进工厂还是提干、参军等各种离开农村的人数比例，都是本地知青更高。外迁也是“曲线回城”的常见方式，同样是本地知青的变动比例较大。⁴⁴表 3 亦可以清晰表明，婺源县的本地知青的变动比例也高于上海知青。⁴⁵

但这种歧视性对待出于地方本位主义的利益考虑，所以一旦接受上海知青变得有利可图时，基层干部马上就会改变态度。1973 年以后，上海为支持江西做好对上海知青的工作，加大了对江西的物质支持，为上海知青所在的社队及知青队提供了大批农业机械。于是，一些基层干部转而愿意接受上海知青，而不愿接受本省知青了。⁴⁶正如潘鸣啸指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对知青的态度关键在于看其是否有使用价值。⁴⁷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与农民对上海知青的不欢迎态度与知青本身的言行也有关联。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态度的差异外，少数上海知青有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不良行为，引发并激化了农民对于上海知青群体的对立与排斥情绪。新干县鸡峰公社第一批知青都是老三届，多来自上海一些重点中学，总体上在农村的表现较好。但 1969 年 3 月到达新干县的第二批知青大都是 69 届初中生，其中有些人随身带刀，下乡后还强制要求打铁厂为他们打匕首，给当地农民带来极

⁴⁴ 石城县，《下乡知识青年基本情况统计表》，1972 年 5 月 31 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上册，422

⁴⁵ 婺源县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项基本数字》，1977 年 10 月 6 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上册，252

⁴⁶ 江西省革委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关于要求解决知青队（场）农机问题的函》，1975 年 3 月 6 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97

⁴⁷ 【法】潘鸣啸，2009：334

坏的影响。鸡峰公社号称“三宝一寇”的四位上海知青经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搞得当地民众包括其他知青怨声载道。⁴⁸会昌县城郊公社有五六个在不同生产大队的上海知青聚起来号称“和尚队”，有好几把三角括刀，经常在县里寻事打架。⁴⁹峡江县江背公社有一个外号“土八路”的上海知青经常去外面偷东西，或者拦路抢劫其他公社的上海知青。当地人都互相提醒：“要早点回，回来晚了遇到土八路就糟糕了”。⁵⁰上高县某公社，几名有不良习气的上海知青将一农妇放在路边的一篮蚕豆拿走了，引发众怒，这几个知青遭到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围殴，随后被捆绑送到公社。殴打知青的人员中有原妇女主任、两名大队干部、5名生产队干部和几十名社员。事后，生产队长还给参加殴打的农民每人记了4个工分，有个农民在行动中丢了一只手电筒也由生产队来赔偿。⁵¹安远县有一个上海知青小团体“十兄弟”，专门搞打砸抢，还强奸女知青，激起当地群众以及知青的义愤，他们联合起来向上海慰问团告状，要求严惩这一犯罪小团伙。⁵²这些事例表明那些有不良行为的知青影响了基层干部和农民对上海知青整体的看法，而其他大多数知青在这一问题上与当地农民站在相同的立场上。

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也有看重知青的时候，他们会借重敢于大胆直言的上海知青来平衡村内政治，或抵制来自公社的强制性的不合理命令。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各地开始重视和加强对知青的培养，而农村也需要知青发挥他们的长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知青农业技术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之外，农民也倾向于让作为外来者的上海知青担任一些需要刚正不阿、廉洁与奉献精神的职务，来应对村里面错综复杂的人际与宗族关系。例如里陂上村的村民们推荐知青承担会计、出纳、保管、记工员等职务，知青成为生产队的“红管家”，永丰县广播站经常播送赞扬“红管家”的新闻。⁵³再如，云庄大队干部让王宗仁承担“罚议”工作。云庄因为是单姓村，亲戚关系复杂，这项工作很不好做。王宗仁第一次罚议只能罚到知青班头上，以后就对所有的村民一视同仁，甚至大队支部书记家也

⁴⁸ 《王宗仁日记》，1969年3月2日、3月29日。对艾志华、艾志军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3日，江西省新干县云庄村。

⁴⁹ 会昌县“五·七”大军办公室，《当前“五·七”大军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汇报》，1970年9月8日，会昌县档案馆藏，档号89-4-7。

⁵⁰ 对陈九根、刘瑞生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4日，江西省峡江县。

⁵¹ 《一篮蚕豆引起的一场风波——XX公社XX大队知识青年XXX、XXX被绑打的调查（调查人：曾、陈）》，1973年8月，上高县档案馆藏，档号不详。

⁵² 上海学习慰问团安远小组，《安远小组工作汇报》，1974年5月14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中册，457

⁵³ 夏建丰，2015：372—373

照罚不误，因此获得农民的信任并有了“权威”。⁵⁴新干县洋湖公社书记彭某，根据县里指示到生产队强行推行“密植”，这个不合理的命令遭到生产队干部和农民的反反对，但他们敢怒不敢言。知青在查阅了很多资料后，提出过度密植不科学，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大队长不敢公开反对公社的命令，但暗中支持知青的做法，在公社干部与知青中间做“两面派”，最终成功抵制了密植。⁵⁵夏建丰在里陂上村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和大队干部配合默契，以各种方式抵制来自公社的不合理命令，以至于公社领导说他们大队“不合作”，工作“很难推动”。⁵⁶这些事例表明，基层干部与知青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对抗或合作。

虽然一些知青在农村中担任干部，开始发挥作用，但大多数还是生产队一级的干部，进入大队和公社以上的就比较少了，而且担任的职务多为不重要的岗位或者是副职。新干县鸡峰公社云庄大队让知青班班长徐黎红身兼十余职，其中多数为无关紧要的职位，例如妇女队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大队理论小组副组长等等。峡江县回乡知青陈文初很清楚地表示：“大队书记还是要本地人来当的。”⁵⁷

尽管官方宣传以及不少知青在下乡初期都坚定地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但大多数农民从来没有将知青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村里人。尽管有一些上海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婚的事例，但由于生活习惯、地域差异以及知青扎根农村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一些当地青年的父母极力劝阻子女与上海知青谈恋爱。峡江县下乡知青杜郁称：“我母亲说你自己就在乡下，再找个上海女知青怎么生存。”回乡知青朱振达也认为上海女知青劳动能力比不上本地女知青。陈文初则称区域和文化差异也有影响，“觉得她们是上海人，见多识广，不敢去找”。⁵⁸在缩小文化隔阂方面，当地农民从上海知青这里得到的“再教育”反而更多一些，他们愿意让上海知青发挥他们的文化优势：办夜校、演现代戏、唱革命歌曲等等。

正如云庄村老支书在知青刚到农村时所说，“毛主席叫你们来，也会叫你们回去的”，随着招生、招工、征兵、提干以及病退、困退、顶替等多种离开农村政策的出台，上海知青陆续离开农村，其中大多数返回了上海。王宗仁于1975

⁵⁴ 《王宗仁日记》，1974年6月6日。据王宗仁介绍，所谓“罚议”就是一项村规民约。社员们自己养的猪、鸡、鸭，以及分担喂养的集体所有的牛，因看管不严而糟蹋农田或者跑出村子范围的，须记下来并报给生产队给予相应的处罚。鸡、鸭、鹅、猪按只计，分别为4、5、6、10个工分，对于拿工分吃饭的农民算是很严重的惩罚了。

⁵⁵ 朱彤，《我与公社书记的特殊交情》，出自：新干县档案局编，2013：289

⁵⁶ 夏建丰，2015：401—406

⁵⁷ 对陈文初、朱振达、杜郁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4日，江西省峡江县。

⁵⁸ 对陈文初、朱振达、杜郁的口述访谈，2018年12月24日。

年9月通过病退离开所在大队，此时最初一起来的61名知青已不足20人。夏建丰到1979年2月才离开里陂上村，回上海顶替父亲工作。离开时，老队长等村里的头面人物送了他一幅写有“遗爱待民”的锦旗，表达村里人对他在里陂上生活10年尤其是担任队长的充分肯定，但他们心底里则另有一番滋味。里陂上村唯一一个在外面工作、领取国家工资的五十多岁的干部，找到夏建丰，严肃地问：“前几年去大学读书的都是你们知识青年，我们农村人就有意见。现在你们上海人都回了上海，我们农村人的出路在哪里？”面对他的困惑与质疑，夏建丰哑口无言。后来，这位干部自己很快就办理了退休手续，让他在里陂上村种田的大儿子按照顶替政策，成为拿国家工资的城里人。⁵⁹在离开农村成为城里人这方面，农民在心底与知青有着一样的渴望，但他们无法像知青那样返城。

五、结语

江西省各级政府在宣传贯彻“12.21”指示时的高调表态、热烈欢迎等大张旗鼓的政治仪式，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作的常态。但仪式化的“政治落实”并不能确保最高层指示所要求的具体任务的真正落实。江西省各地在接受知青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越到基层问题越多的现象，显示出政治动员与政策贯彻的实际效应在从上到下的过程中层层递减的趋向，这也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运作的常态。

研究表明，即使在“文革”那种“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权威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之间在基层乡村仍存在着明显的张力。政治因素之外，接受知青的任务无法落实还要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解释。经济落后的江西农村没有能力接纳十多万上海知青来插队落户，这制约了各级政府的知青工作，决定了基层农民对知青下乡的基本态度。这一状况也凸显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内在困境。

公社制度下的农民经历了合作化以来的各场政治运动，他们习惯了政治动员和裹着各种口号的政治任务，也形成了一套应对方法。对农民来说，上山下乡运动与之前的合作化和公社化一样，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行礼如仪地高呼着政治口号欢迎知青，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国家的政策，消解其中影响农村日常生活和自身利益的内容。农民对知青下乡总体上是不欢迎的，这种不欢迎从根本上

⁵⁹ 夏建丰，2015：500

说是对国家政策的不满。农民会跟在工人、学生后面高呼政治口号，虽然通常他们的声音没有后者那样响亮，但一旦上面下达的政治任务与他们的实际利益发生冲突，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就会产生自己的担忧与顾虑。早在1955年上海组织青年垦荒队到江西时，江西的农民就担心，上海青年垦荒队到来后要拿出土地，自己的田不够种而影响生活，还担心垦荒者劳动力不强，会增加自己的负担，而一些干部则担心上海人能说会道不好领导。⁶⁰虽然垦荒队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不完全相同，但相隔十多年间农民对外来者担忧的原因竟然完全一样。

事实上，政府对农民的这些担忧是清楚的。1964年在计划大规模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时，中央就要求向农村的同志“交底”，告诉他们国家组织知青下乡“专有一定的投资，不会揩集体和社员的油”，“以消除他们怕背包袱、减少收入等思想顾虑”。⁶¹但因为政策制定与具体落实间的差异以及贯彻的递减效应，农民的顾虑实际上却无法消除。当他们认为发生了国家“揩集体和社员的油”的情况，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抵制，例如压低知青的工分、克扣知青的收入。另一方面，当有条件时，他们又会尽一切可能去“占国家的便宜”，寻找补偿，例如挪用安置经费、拖延盖知青住房。至于那些高调的政治宣传与最高层想要的“社会主义新人”，“无论什么东西，无论叫得多响，到了基层，老百姓都不接受。除了评工分，你说啥就是啥，爱说啥就说啥。到了基层一切都烟消云散。”⁶²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与下乡知青间的矛盾是长期以来农民认为国家要“揩集体和社员的油”这一想法的反映。他们对政策的执行或抵制延续了一直以来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国家要“揩集体和社员的油”与农民想“占国家的便宜”之间的矛盾。

江西农民对上海知青的不满只是两者关系的一个方面。作为中学生（有些还是高中生）来到农村的上海知青，普遍具有高于农民的文化素质，这是农村急需的智力资源。所以夏建丰所在的生产队农民会请上海知青担任生产队里的会计、出纳、保管员等“红管家”的职务，这种情况在江西各地并不少见。此外，1973年中央30号文件后，上海加大了对江西省尤其是接受上海知青的县社的物质支援，也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对上海知青的欢迎程度，甚至出现愿接受上海知青，而

⁶⁰《关于德安县安置上海垦荒群众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出自：金大陆、金光耀，2019：下册，385

⁶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4年1月16日，出自：国务院知青办编，1981②：26

⁶²吴思，1993：158

不愿接受本省知青的情况。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农民与知青彼此之间也加深了理解，会相互配合或联合起来消解和抵制来自上面的不合理的政策。

农民与知青是两个身份差异十分明显的群体。政府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认为这将极大地缩小城乡差别。实际上，大批知青来到农村后，农民更加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别，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根本不同。因此，直至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绝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将知青看成是自己村子里的人，尽管两个群体中有些人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⁶³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但政治不能解决知青到农村以后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绝大多数知青始终想回城，农村干部和农民也希望他们早点回去，以免去知青下乡带来的各种麻烦。因此，当上山下乡运动临近结束时，中央领导说知青下乡国家每年花20个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其中就包括农民的不满意。⁶⁴毛泽东“各地农村的同志欢迎他们去”的指示最终在农村基层无法落实，以失败而告终。■

参考文献

著作

顾洪章主编，200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国务院知青办编印，1981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内部资料。

国务院知青办编印，1981②，《知青工作档案选编》，内部资料。

胡平著，2011，《百年误读：二十世纪中国之侧影》，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吉安市党史办编，2004，《上海知青与井冈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金大陆、金光耀主编，2019，《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三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2014，《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刘小萌，1998，《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⁶³ 这种私人间的友谊及恩情是多年后知青怀念农村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重返故地进行捐资助学、扶贫、修路架桥等为农村做贡献的动力源泉。

⁶⁴ 顾洪章，2009：145

潘鸣啸 (Michel Bonnin), 欧阳因译, 2009, 《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宋永毅主编, 2014,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

吴思, 1993,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 广州: 花城出版社。

夏建丰, 2015, 《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 里陂上村杂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干县档案局编印, 2013, 《五百知青一个梦》, 内部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1982, 《农业集体化重要档汇编 (1949-1957)》,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2004, 《地缘: 上海知青与江西》,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文章

王战口述、金大陆采编, 2018, “上海知识青年留在井冈山的足迹”, 《世纪》, 第6期。

论文

林升宝, 2016, 《“继续革命”的困局——上海知青学习慰问团研究(1969—1976)》, 历史学, 博士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未刊资料

上海知青研究资料中心所藏知青王宗仁资料: 王宗仁日记与笔记。

口述访谈

对艾志华、艾志军的口述访谈, 2018年12月23日, 江西省新干县云庄村。

对陈九根、刘瑞生的口述访谈, 2018年12月24日, 江西省峡江县。

对陈文初、朱振达、杜郁的口述访谈, 2018年12月24日, 江西省峡江县。

对桂修铭的口述访谈, 2018年12月21日、2019年5月3日, 上海市。

对刘璧瑛的口述访谈, 2018年12月25日, 江西省峡江县。

对汪泽峰、吴昌健的口述访谈, 2018年12月25日, 江西省峡江县。

【评论】

文革词汇随想

唐 燕

文革很大程度在话语层面上被推波助澜。文革语言是当时社会状态和社会风气的反映，其发生发展是社会动乱的必然。乔治·奥威尔说，“思想可以败坏语言，语言也同样可以败坏思想。”那些败坏了我们思想的文革语言是对汉语的侵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叛，是对中华文明的亵渎。

很难估量文革语言对我们思想和心灵伤害的程度，然而如同文革理论没有被深刻反思和彻底批判，文革语言也未被认真清算，甚至其中的一些至今还被我们使用着，我们并没有远离文革，仍身处文革的延长线上。秉持科学的态度审视文革语言的发生、发展及危害，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

—

文革产生了很多特定人群及其相应称谓，如：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保皇派、逍遥派、中间派、骑墙派、两面派、小爬虫、变色龙、政治扒手、红五类、黑七类、狗崽子、老三届，老五届、联动、红小兵、黑帮、走资派、臭老九、工农兵学员、可教育好的子女、五一六分子、三反分子、党阀、军阀、学阀、政治骗子、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等等。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牛鬼蛇神”，当这个词出现在那篇著名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标题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大多数民众特别是在无神论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广大青年学生既颇感陌生又莫名其妙。

该词源自佛教，本指阴司里的鬼卒。

作为信仰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却对起源于帝王文化的中国鬼文化颇有兴致：

早在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用过这个词：“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16页），指的是传统戏曲中的鬼戏。

1957年当毛说“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时，则转指右派分子了。

1959年5月，他在会见苏联、匈牙利等十一国访华代表团时讲了《聊斋志异》里的鬼故事，并指示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组织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该书于1962年2月出版。

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指责境外势力“心怀鬼胎”，并在批评一些干部怕群众时说：“越怕，越有鬼。”

1960年12月，毛过67岁生日时回忆他1932年被开除党籍解除军权的经历时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1966年7月，他在《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1966年3月，他严斥“中宣部是阎王殿”，指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1966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作为“毛主席语录”正式发表。

在“红八月”红卫兵运动高潮中，一首宣扬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红卫兵歌曲被命名《“鬼见愁”歌》，这里的“鬼”自然指那时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这首歌名可视为红卫兵刚刚接触了毛鬼文化思想的折射。

二

继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6月2日《人民日报》紧接着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并在发出“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的号召里连用了三个“黑”字。

自此，这个表示黑暗势力和罪恶的颜色符号“黑”被充分利用：黑会、黑手、黑干将、黑伞、黑线、黑话、黑书、黑风、黑七类、黑六论、黑八论、黑后台、黑势力、黑材料、黑指示、黑修养，不一而足。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里，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统称“黑帮”，含蓄地说明这些反革命分子在暗中活动及其团伙的性质。“黑帮”只在文革初期使用过，是个过渡词，“黑帮”和“黑帮分子”后来被“牛鬼蛇神”取代。“牛鬼蛇神”还派生出“牛棚”，指关押牛鬼蛇神的所在。

文革词汇中与“黑”相对的不是“白”，而是“红”：红卫兵、红太阳、红司令、红小兵、红宝书、红色江山、红色造反、红色政权、红五类、自来红、代代红、一片红、红海洋等等数不胜数。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红色恐怖”，只把牛鬼蛇神们批倒斗臭、炮轰、砸烂、火烧、绞死、油炸、活埋、踏平、横扫……还不够恐怖，还不足以体现革命的战斗精神，还要给恐怖加上“红色”修饰和强化，唯其如此才能彰显出革命的血腥和暴力。1966年8月，北京六中红卫兵用被殴打者淌出的鲜血，在施暴现场的墙壁涂抹上了“红色恐怖万岁”六个血淋淋的大字，将文革的凶残嗜血性活生生展示了出来。

在上述绞死、油炸这类动词中，最频繁使用也最耐人寻味的是“造反”。造反本是民间对政变、谋反、夺取政权所发动叛乱的俗称。自古以来，驯良的中国百姓每听到“造反”二字无不胆战心惊，连受尽凌辱的阿Q也知道“造反会遭砍脑壳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岂可轻言“造反”？所以当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时，引起了该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极大反感和明确反对。

可是十天后当他们看到《二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作者引用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时，无言以对了。而当人们得知毛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亲笔回信“表示热烈的支持”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便瞬即成了红卫兵对牛鬼蛇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破四旧”时打砸抢杀烧无恶不作，以至整个文革期间革命群众为所欲为的护身符了。

三

正因为受到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那条毛“造反”语录的蛊惑，清华附中红卫兵把那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政论文写得既杀气腾腾：“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又十分粗野：“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这种一反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把骂人脏话以文字赤裸裸地写在书面语的政论文中的做法令人震惊，毛却赞其为“很好的大字报”。随之，这三篇“檄文”被反复传抄翻印，迅疾流传全国。于是，不仅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现，“造反”成了不容置疑的革命行动，而且粗俗肮脏的谩骂之语成了造反的标志。“他妈的”瞬间成了最流行语，差不多红卫兵写的所有大字报都必加上几句“他妈的”“滚他妈的蛋”，几乎每个青少年国骂不离口，连那些一向文质彬彬曾有良好教养的女学生们也极力学作革命的痞子，不久便终于将这三个字从说不出口到冲口而出，既显示了离经叛道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也体现了自己追随大众化工农化。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就要求“学群众的语言”。固然群众语言通俗易懂有其生动质朴的一面，但也有粗劣低俗的一面，所以不该不加分析和选择地全盘接受。学习群众语言时不应排斥传统规范的文明用语，尤其不能抛弃经典文化。效仿平庸的、缺乏深度的群众语言更是知识界深入学术理论探讨时不可取的。

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中，诸如“混蛋”“王八蛋”“见你妈的鬼”“去你妈的蛋”等污言秽语常常挂在红卫兵们的嘴边，甚而，被谱写成《造反歌》理直气壮地广为传唱：“要革命的就站过来，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不过，因为文革使绝大多数人不敢再留下记有文字的东西，包括不再写日记，所以这些频频从嘴里吐出来的脏字一般只见于当时的大字报、传单和红卫兵小报，未如拉法格说“转入纯粹是文学的领域之内。”（“革命召唤了一个新的阶级参与政治生活，并且同时创造了这种政治生活……这种新的政治条件要求一种同样新的语言，嗣后这种语言又从政治界转入纯粹是文学的领域之内。”《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第75页，保尔·法拉格著，1964年11月第一版）

1967年，江苏两大派群众组织对造反派夺省委的权意见不一，一派说“好得很”，另一派说“好个屁”，于是他们各被冠以了“好派”和“屁派”。在没完没了的派斗中，无论哪派都人人“屁”字不绝于口，不绝于耳，更不觉其丑。

1965年秋毛在他的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惊世骇俗地写出了“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的诗句。直接以“屁”字入诗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倒不是无人在诗歌中涉及这个生理现象，而是都设法避开了这个字，在诗词这个重在给人

以美感的高雅文学艺术形式中本该如此。中国人就有过颇为文雅的描述：“依稀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

伟大领袖在他的诗词中发出的这一绝响，同江苏广大革命群众口里千万次重复着的这个字，竟如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真是一道奇特的文革景观。

文革中两派群众互斗时除了彼此谩骂、对报纸上的文革语言鹦鹉学舌外，“打语录仗”独具特色，空前绝后。一派首先找出一句毛语录占据政治制高点攻击对方，如若不服就被扣上“抗旨”的帽子，对立面则找出另一句有利自己的最高指示这个不容置疑的法宝予以还击。双方如此反复多次，最终谁也没克敌制胜，讨了个没趣。

“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能说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这条语录出自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两派辩论时，一派常整句地或只取其中“不要脸”三个字攻击辱骂对方，另一派则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或索性只用“不须放屁！”四字回击。——如同小孩吵架。

令我们无比自豪的，延续了几千年中华文化命脉，积淀了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丰富的民族心理、丰饶的民俗风情，丰厚人文底蕴的，曾造就了庄子、屈原、李白、杜甫、王勃、苏轼，曹雪芹等一代代优秀杰出文人，创建了诗经、楚辞、乐府民歌、汉魏古风、唐诗宋词、元明剧曲、明清小说等一座座神奇瑰丽宝库的汉语，文革中却被如此糟蹋，从上到下的思想水准和语言水平竟到了如此低下粗鄙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

四

文革语言中，激进的言辞既反映了人们受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文革理论的毒害而扭曲狂热的心态，又反过来愈加激发出了人性中的原始暴力，那些攻击对方的文革词汇无不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狗胆包天、混账至极、反动透顶、猖狂进攻、大肆反扑、居心险恶、口蜜腹剑、血口喷人、狼子野心等等举不胜举。

由于汉语不像英、法、德等语种有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为了显示极端和绝对，“大”“特”“极”“万”“无限”“最”等字派上了用场：大毒草、大批判、大杂烩、大夺权、大树特树、大放厥词、大刮妖风、大肆鼓吹；无限热

爱、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无限敬仰；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极端反动、极其热爱、穷凶极恶、罪大恶极；最高指示、最革命、最伟大、最热爱、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最大最大最小最小……

“最大最大，最小最小”出自林彪的“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这种孩童式的将“反复修辞法”用于“最”字的句式引发了不知谁的模仿：“林副统帅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即使该模仿者是在吹捧这位副统帅，也很难令人不感到内中暗含着讽刺。

五

文革词汇分“新生”和“旧用”两类。

“新生”的如破旧立新、三支两军、文攻武卫，反潮流、群众专政、斗私批修、给出路、再教育、早请示晚汇报、革委会、筹委会等等，这些词大多随着文革结束而寿终正寝。

“旧用”的大量出自毛语，如：纸老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香花、毒草、何其毒也……。那时几乎人人《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毛主席语录”不离口，人们大量成段甚至成篇地驾轻就熟地引用、背诵毛语毛文，这既是活学活用毛思想的行为，又是忠于热爱伟大领袖的表现，无疑也是个人崇拜的结果，与此同时，也潜移默化地统帅着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

“写检讨”“做检查”虽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大，但属旧词沿用。因为早在井冈山时期，这两个词就在党内多次使用了。检讨书里除了检讨者对自己罪错的反省和自我批评甚至自我咒骂外，和群众的大字报、批判稿、大小会发言稿一样，大多是照抄报纸上的文革词语，因此虽然写检讨的牛鬼蛇神之间从未敢沟通，检讨书里的文字却大量雷同。不过检讨里见不到“忏悔”二字，中国文化没有忏悔只有后悔。

为了端正检讨的态度，检讨书里没有任何表达委屈、痛苦、悲伤等的情感用语，被整肃者们本就被剥夺了表达情感的机会和权力，所以文革词汇中极少出现

恐惧、悲愤、痛心、难过、郁闷、苦楚、悲凉、绝望这类词。

情感是需要通过文字表达的，可是“亲不亲，阶级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文革期间即使在夫妻、情人、亲人之间，人们也不敢言“爱”。除了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激情、对牛鬼蛇神的刻骨仇恨和对毛愚忠而生的爱戴之情，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喜怒哀乐都属于封资修之情受到抑制。理性、中庸、温和、克制、忍让、温文尔雅等言行是小资产阶级的脉脉温情没有容身之地，温良、恭顺、优雅、淑女、闺秀、绅士等词语连听一听都觉得耻辱可笑，取而代之的是骄横、粗暴、当仁不让、风风火火、泼辣、造反派的脾气、悍妇、狂徒、猛男、闯将等等。文明礼貌的委婉用语也都被视作封资修的假门假事儿遭到抵制和批判，所以我们文革这代人的情感神经不知不觉成了“大条”，情商极低，并贻害终生。

尽管文革制造了一类又一类一批又一批层出不穷的敌人，却被用“一小撮”形容，以示对敌人的蔑视。“一小撮”属旧词新用，本是容量单位，为一市斤的千分之一。此外，火烧、油炸、自来红等也是旧词被赋予了新意。

“拍婆子”曾在北京流行一时，指处于青春期无所事事的男孩子在街头巷尾通过与素不相识的漂亮女孩儿搭讪交朋友的行为，该词带有准黑话性质。它的重现是老红卫兵失势后张扬自己的存在，以及对文革厌倦、不满、不屑与疏远的反文革意识的表现。一方面文革将一切有教养的言行斥为封资修，另一方面没完没了的空泛的政治说教越来越令人厌烦，一本正经地重复那些从上到下高度一致的文革言词实在愚昧可笑令人不齿，这个俚语便应运而复生了。

还有一些文革词汇虽是新生，其词义却早已有之，比如“红五类”。

红五类“根红苗正”，有天生的“红色基因”，是“红色江山”的阶级基础。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红五类及其子女就占据着主流社会的核心地位，在入团、入党、参军、提干，升学、就业，以及晋级、调薪、分房、医疗等各个方面享有特权。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就明确规定：“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

尽管一直以来，这些优先权就始终惠及着该《通知》所规定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五类子女，但“红五类”这个称谓是在文革初血统论猖獗之时才由红卫兵首创并广为传播的。

“黑五类”源自1950年8月4日政务院第4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该决定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这四类人称为“四类分子”，加上1957年被划的右派分子，统称黑五类。文革期间又揪出了叛徒、特务、走资派三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排在第九，遂有了“臭老九”这个别称。

六

几乎所有如：查三代、给出路、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批改、划清界限、再教育、反潮流、三突出、吐故纳新、天天读、戴高帽、喷气式、一锅端、惊天地泣鬼神、群丑图、反党乱军、文攻武卫、三家村、四家店、军事俱乐部、早请示晚汇报、党变修国变色等等等等文革词汇中，不见外来语的踪迹，可见文革语言的闭塞。

由于闭关锁国和被严重洗脑，人们的头脑受到极大束缚，毫无思想和灵魂的自由。文革初尽管民众被赋予了结社、写大字报等的“自由”，但愚顽闭塞的，天天想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以为自己是全人类最幸福的井底之蛙们能“自由”地写出什么水平的大字报？而结社自由只不过是允许成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战斗队，从文斗到武斗，群众斗群众而已。少数把斗争矛头对准过党组织的，最终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改革开放前，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只是与“散漫”同义，根本不懂“自由”的真谛。当被户口制度紧紧束缚，习惯了迁徙和选择居住地被严格限制的人们，被迫上山下乡去五七干校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人身自由。

1966年8月18日毛为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尽管宋彬彬本人并不情愿，但在迷信红太阳的狂潮中，她丧失了不被改名的自由。自宋彬彬被改名后，人们纷纷把自己含有倩、茜、茹、秀、淑、芬、芳、兰、香、花、英、娜；仁、宗、礼、义、恭、贤、修、祥等字的名字改为向东、卫东、卫红、卫彪、志红、永红、忠党、永革、文革、兴无等满含个人崇拜或革命造反之意的字词。许多学校、工厂、街道、商店、医院等也争先恐后地把所谓属于“旧文化”的名字改掉了。百年老店瑞蚨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荣宝斋改成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协和医院成了反帝医院，举不胜举。

文革期间，全社会的语言都陷入了严重的僵化、低劣化和粗俗化，以致文革

刚结束就不得不开展包括“讲文明”和“语言美”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七

1982年叶剑英主持修改《宪法》时删除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既是在政治上对文革的清算，也是在语言上的清除。如今这个词已经隐退了。

然而，文革语言及其词汇对我们的人性、思想和文化影响至深，至今我们缺乏独立自由的精神和应有的知识学养，少有高贵的谈吐和优雅的言词。我们用语言表达自己时没有诚恳朴实的心态，没有博爱精神和爱的情感，没有平等的、维护自己与他人尊严及权利的意识。互联网上可以匿名发表言论的特性更使我们口无遮拦，网上那些简单的认知、武断的言辞和无谓的争吵如同文革再现。

2019年初清华大学一学生向校领导提交秘密报告，揭发他老师的“错误言论”，并声言要在大学课堂上“扫除牛鬼蛇神”。校方对这个文革词汇坦然接受，没有评论更没有批评。词汇是对社会变化和语言变化最快最敏感的反应，“牛鬼蛇神”这个文革词汇再度被当局默许污蔑整治学校教师值得密切关注和高度警惕。

语言有很好的文学质地，能够把我们带到很高的文明层次，从而使我们享受到高品质的精神生活。理性的交谈和优雅的用语带来的是协商、平等、包容、和谐。善待善用语言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就是善待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人人都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让我们警惕文革语言及其源头的卷土重来，守护住语言的纯洁性和神圣性。☞

【评论】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 (70)

李南央（美）

回顾与前瞻

写下这篇“跟进”的标题才意识到，我已经写到第七十篇了。应该同关注这个案子的朋友们一道，对起于2013年10月29日的“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做个回顾。

在我决定写“跟进报道”之前，有关这个案子的文章是一封我致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的公开信及一篇附文“‘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一块试金石”，发于

2014年5月号香港《争鸣》杂志——整整6年之前。这之后开始了我每月的“跟进报道”。

发到第40篇时，《争鸣》停刊了；写到第56篇时，父亲李锐走了，那一篇的副标题是“父亲走了，我还活着……”；直到第60篇，国内局势更趋恶化，我的委托律师不能再替我将“跟进”快递给此案的审判长贾志刚；我拒绝住笔。

前不久，看到网上流传的一篇丁东先生撰写的《犟人李南央》，他说我：“执着地诉讼，持续数年，每月一呼……”我为什么这么“犟”呢？我在2014年4月30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李南央签具的致三中院公开信的前言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希望这件事无论结果如何，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下，走完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一天不完，我一天不会放下手中的笔。

我在公开信的附文中还说：

李锐如今已是共产党内硕果仅存、寥若晨星的元老。他的这本书是回顾自己跟随共产党一生的所思、所想和对共产党所犯错误根源和教训的沉痛分析，其愿望是希望党能纠正错误，不要再欺人且自欺地死抱住“伟光正”不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主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立起一个国强民富的公民社会。结果，我从香港带入北京的53册样书，在2013年10月29日中午时分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审查，10月31日上午10点海关即电话通知审查结果：为禁止入境物品，并于11月12日发出“海关处罚告知单”。我全权委托的夏楠律师随即向海关提起行政复议，海关于11月25日发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维持原处罚告知意见”，将含53册《李锐口述往事》在内80本书刊的性质统统钉死。这与2008年7月2日胡温时代发生的上海海关扣留《李锐日记》和《李锐家信集》，经本人在网上发出公开信质疑之后，第4天即将扣书全部归还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

……

很多老一代共产党人，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我的父亲李锐，他们在党内奋斗一生所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一党专治的政权，而是一个由自己的党主持，服务于人民的政府。将军队还给国家，将现行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笔杆子，还给人民，放弃保卫党的“红色江山”的意志，转换为全力维护人民权益的理念，党的事放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办，难办的国事按法律程序靠众人的力量推动，这才是根治腐败、拯救生态、聚集民心、走出险境、复兴中华的治本之策。紧紧抓住笔杆子，体制就变不了；体制不变，不管拍多少苍蝇，打多少老虎，不过是唱新曲、走老套，耽误着濒临危崖的中国已经不容再拖延的时间。松开笔杆子是件非干不可的事，否则无异于继续向深渊一路跌落下去。

可悲的是，在我写出这篇文章的六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在引领着国家继续向深渊一路跌落下去；不对，是引领着“中国人民”向覆灭一路狂奔。

前不久出了个“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广大人民群众”居然疯狂地撕咬起方方。方方的日记我没看多少，方方的作品我一篇也没有读过，但是方方出书，根本同她所写内容毫无关联。写书、怎么写、写了又到哪里出，压根儿就是方方的自由。更何况方方是个体制内的准官员，她原本是想在国内出的，不过“人民群众一声吼”，把所有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吓得噤若寒蝉，望而却步。

这个党把这个国家的一些“人民”教育成了恶狼，撕咬自己的公民；这个党把媒体豢养成疯狗，满世界狂吠，喷出“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是人类公敌”这样的嚣张。

父亲李锐在《李锐口述往事》中说：

现在看起来，群众运动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形式，容易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副作用太多。这个教训一直没有汲取，到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完全失控，天下大乱，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达到崩溃的边沿。

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建党方针更加明确：党要纯洁——组织要纯洁、思想要纯洁，这个教训太厉害。我们一直没有认真总结过去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从观念上根本改变延安整风后形成的：党总是绝对的正确，党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永远光荣、伟大的这个荒唐的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都无从谈起。

含有这样文字的书，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让国民看到。而我，一介草民，能做到的就是为了这样的文字的自由传播，绝不停下我抗争的脚步！

【序跋】

一个知识分子灵魂升华

——刘海鸥《画说我的一生》序二

忆陵

打开海鸥的《画说》，童年熟悉的一切扑面而来。我和她是培元小学六年的同学，我熟悉她那在脸上投射出阴影的长睫毛，跟她在教室外的台阶上挤过“狗屎”，曾长时间赖在她家看那满柜满抽屉的书，还曾一起循着墙上的印记找“特务”，一起演出《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大灰狼》……海鸥的画充满了细节，当我看到她画的送水师傅车把上的棉套，不禁叫绝，一下子就被带到那个遥远的逝去的年月里。

上中学后，我跟她来往少了，但在《画说》中我惊奇地发现，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中竟做着那么多相同的事情。不仅看一样的书，唱一样的歌，还一样投入阶级斗争，一样向工农学习，一样“无限热爱”，一样遭遇“唯成份”，一样拼命改造思想，一样在文革中造反，串联，折腾，被折腾……这些“一样”说明：海鸥画的其实不是“我的一生”，而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像一部大洗衣机（海鸥的比喻），我们就是其中的微不足道的物件，被无情地裹挟着搅拌着，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谁都无法逃脱。

海鸥在小学的评语经常是“自由散漫”，操行评定常常是“中”。因为她从小就是个性鲜明有主张的人。万幸我们小学颇有民国遗风，老师呵护着我们，自由天性尚得以保存。随着社会上必须用某个人的思想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随着虚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目标的树立，随着我们青春期热血年代的到来，纯洁的海鸥就开始虔诚地改造自己了。她把自己身上那自由的、浪漫的、有创造力的东西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去克服。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开始了自觉地彻底地自己给自己洗脑的模式。”

文革中她偶然听到小提琴的声音。“那曲子钻进了听惯铿锵歌曲的耳朵，简直让人晕眩，心醉，它带给我一种温暖，一种哀伤感动。”同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又听得她“浑身热血沸腾，深深被他们的革命朝气所感染，心里汹涌着向上的冲动。”海鸥接着说：“我在这两种感受中挣扎着，觉得自己不可救药。”“我性格中的自由元素与我渐行渐远。我开始像一块橡皮泥，被放进模子，渐渐

塞满模子的角角落落。”我看到这里，真有点心酸。我们那个才华横溢，个性张扬的海鸥去哪儿了？她还能展翅飞翔吗？

在“不予录取”的打击下，在棍棒皮带的围殴中，在艰苦到非人的劳作中，在被鄙视被践踏尊严的环境压迫里，她都曾努力寻求这一切的合理性，使自己处在矛盾的自我否定的状态中，进行着痛苦的挣扎。十年文革中她几乎脱胎换骨地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按照文革指定标准变成的新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士。

1978年，海鸥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这是她生命中重要的转折。我们这代人，在20多岁前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不幸与人类文明成果隔绝。30多岁才迈入北大课堂的海鸥被17世纪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光辉照亮了心灵，她的思想观点、方法以及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为她以后的人生打下了基础。当年北大的自由空气，北大教授的开放思想，使她的“思想改造”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点一点地找回了自我。她开始“动摇了二十多年来以权威形式灌输给我们的对某种思想体系的信念，动摇了我已经形成的融化在阶级划分中的黑白思维方式。”

万恶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海鸥不仅被逼上了绝路，也彻底认清了事情的本质，勇敢地站到了这个制度、体制的对立面。她终于获得解放，回归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飞向了广阔的天空。

凝结着海鸥晚年心血的这部大作，值得细品细看。不仅从中看到荒诞社会40年里的方方面面，也看到个人在这时代中的沉浮与觉醒。

海鸥在清水里泡，血水里浴，碱水里煮，没有像猪肠子一样被洗白被吞噬，而是挣脱羁绊，完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灵魂升华的过程。

我真为我的同学感到庆幸，也为她这部作品发出由衷的赞叹！

【序跋】

《北京大学文革研究文选》编者按

胡宗式 章铎 编

多年来，一些北大“文革”的亲历者写出了数量不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

容涉及北大“文革”的多个阶段。但是，亲历者在史实的认知和基本观点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最重大的差异，就是如何评价聂元梓、孙蓬一和北大校文革。

我们认为，聂元梓、孙蓬一在文革中是坚决反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的。他们虽然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绝不是“四人帮”一伙的。工军宣队对他们的迫害，校党委对他们的处理，文革后对他们的刑事惩罚，是不公正的，是冤案。

1968年8月军工宣传队进校后，聂元梓一直处在被审查、被批判的地位。1969年3月毛泽东又派8341宣传队进北大，继续清算聂元梓和校文革。1973年，掌握北大大权的迟群、谢静宜等将聂元梓、孙蓬一打成“五一六分子”，并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抓捕“四人帮”之后，新的领导人“照过去方针办”，再次对聂元梓等人进行清算。1978年4月19日，北大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党委副书记韦明在会上宣布：经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1973年已被开除党籍了），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后，立即由专政机关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

更荒诞的是，自1968年下半年就受到军工宣传队审查、批判达8年之久的聂元梓、孙蓬一，竟然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与批斗他们的谢静宜、迟群等被同台批斗，似乎她是谢、迟的同伙。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7月1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孙蓬一有期徒刑10年。

以樊能廷、张从等为代表的北大“反聂派”认为：“聂元梓被历史惩罚，罪有应得”；“反聂是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弘扬”；⁶⁵“我们在北大文革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趋炎附势、随恶从流，而是坚持了人性的良知，顺应了民主的潮流”。

⁶⁶

2021年，由樊能廷、张从、奚学瑶主编的《莫教青史尽成灰——聂元梓研究与批判》出版（时代文献出版社）。在该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北大文革中，聂元梓对内对外，不断发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文革后，虽然聂元

⁶⁵ 张从：《探史求真集》之“序四：永远的北大精神”，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

⁶⁶ 樊能廷：《北大文革中的聂元梓》，载电子杂志《昨天》第184期。

梓、孙蓬一这两个罪大恶极的坏人受到刑事处分，而杀人、打人、抓人、刑讯逼供具体作恶者却有漏网，伙同他们作恶、残害无辜，犯下令人发指罪行的一些帮凶，每每毫发无损，逍遥法外。左的遗毒，长期存在，起起伏伏。更有聂元梓的党羽，公然撰文出书，不惜歪曲历史，掩盖聂元梓的罪恶，鼓吹‘人民文革’，为聂元梓翻案，甚至为她歌功颂德，强说自己一贯的‘政治正确’”。

现在提倡“不忘初心”，什么是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初心”？请看其1967年8月17日的“成立宣言”和《新北大报》社论。⁶⁷“成立宣言”罗列了聂、孙的诸多罪名，最严重的就是“分裂中央文革，炮打谢副总理，动摇北京市革委会的革命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等。《新北大报》8月30日发表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表达了井冈山兵团要在北大进行“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的决心：“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在路线和政权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将‘倒聂运动’进行到底！必须将一切权力全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简言之，北大井冈山兵团的“初心”就是站在极左的立场上，紧跟中央文革的激进主义路线，打倒温和、右倾的聂孙，取代校文革。樊能廷等人故意忽略其“初心”，反而把“反聂”说成“是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弘扬”，这不是开历史的玩笑吗！

与此同时，“反聂派”坚决捍卫有着重大史实错误的《北京大学纪事》的“信史”地位；在关键的问题上不提供所需要的史实依据，随意发挥；无视他人提供的历史事实，对一些与自己认知不一致的真相，一概拒之门外，哪怕是白纸黑字放在那里也不认账。他们还无端攻击那些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动不动就给扣上“为文革翻案”的帽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需要指出的是，樊能廷等人作为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般成员，对北大文革中的一些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原井冈山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发声）。他们的观点和立场只能代表极少数人，而不能代表广大的井冈山兵团群众。

在研判文革时，不能脱离当时具体的历史大环境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许多现在看起来荒唐透顶的事情，在那时却被相当普遍地看作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文革初期，我们这些亲历者，确实受到了一个了“崇高目标”的鼓舞，不响应毛

⁶⁷ 参见胡宗式、章铎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5月。

泽东的号召，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区别的是，在那种条件下，什么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什么错误是上当受骗，什么错误是出于自己不纯的动机。

编者相信，凡仔细看过本书的读者，必会对北大文革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有一定认识。“防止文革重演”，任重而道远。📖

【述往】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三）

杜钧福

十三

在这场思想动荡中，最深刻的，和普通群众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一个阶级关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搞错了。不该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这错误仅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其根源？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共产党员是否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特殊材料制造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不同的见解、派别仅是认识的差别还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这些问题，远比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是非问题要深刻的多，也更多地涉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这也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不同意见的根本分歧点。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发生的事就是造反派的分裂。

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人就看出了造反派必然胜利。胜利后怎么办？一些理论家开始预言。主要是北航的一些文章，说造反派还要分化，一些人跟不上革命形势，要落伍；而真正的革命者则继续前进。他们勾画出的这一模式倒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不断从激进派中分裂出更激进的派别来。

与此相关的是造反派中的左右之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引起我所造反派内部争论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是否与保守组织《革命串联队》一起开会。后来没有一起开。第二件事是一件到院部造反的行动由于所大队领导不力而流产。比较实质的分歧则在于对保守派组织的看法。

一个口号和一个组织把这些分歧明朗化。

一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左派”，是地院《东方红公社》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初期提出的。地院也是个出思想的地方。这个口号实际还有下半句，那就是“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在他们学校的标语上看到的。这个口号在当时确实有点惊世骇俗，因为所谓左派显然指造反派，而造反派这样的人，人们从未将他们和左派相联系，更不用说掌权了。把这件事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更是匪夷所思。《东方红公社》在正式场合（《首都红卫兵》社论）没把这话的下半句加进去，因为他们知道分量。

一个组织指《全国红色造反者革命总部》，是院内一些更激进的人组织起来的。在酝酿阶段有王锡鹏参加，后来退出了。我们几个人曾到自动化所和他们串联，听取他们的观点，觉得很有道理，自动化所赵松年等人给我们的印象也很好，很想参加，但最终没参加，是因为认为他们只是少数人，脱离群众。后来他们这个本来就很小的组织又分裂了，分裂为《全红》和《红总》两组织。全名忘了。原因据说他们只有两个党员，彼此不服，就分开了，一人拉一个组织。这样就注定他们再不会有出息了。当时，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显然更激进，但他们并不认为是在搞分裂，也不站在与现有造反组织对立的立场上。他们说想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因为我们科学院的研究所在全国各地都有。后来中央取缔全国性组织，他们正碰在枪口，就把全国两字去掉了。

他们人少，能量却大。他们发了一个“第一号通令”，支持“一切权力归左派”，说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还发了很多命令，口气很大。

鉴于很多人对这些争论感兴趣，我所《革命造反大队》就把院《革命造反团》的领导和这个组织的人请来，召集群众会议听取他们的观点。《革命造反团》来的是王锡鹏和数学所的邹协成。《全红》来的是声学所的张家兴。他们谈得并不针锋相对，而是很客气。但所里的人对“一切权力归左派”却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必然结论，有人则认为这口号表现造反派狂妄和不团结群众。王锡鹏参加了《全红》的筹备，现在却当了《造反团》的领导。我怀疑这里面有什么交易。

后来所里只有一个人参加《全红》。对“一切权力归左派”也不再争论，但分歧显然存在。造反派几个很活跃的年轻人，组织了一个跨战斗组的写作小组，写大字报署名《风雷激》。他们也请我参加，说这是造反大队的写作班子。我以这个名义写了两张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字报，以批判刘少奇的

方式宣扬我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变化的理论。《风雷激》的其他大字报我大部分事先没看。我理解这是因为它是写作班子，不是一般的战斗组。

《风雷激》包含一些风云人物，特别是有两位干部子女参加其中，在所内为人所瞩目，在院内也有些风头。而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位叫王昌衡的。所里人都不太喜欢这个王昌衡，觉得他是投机派。我刚回所看大字报时，就看到过他在68后反击政治部的人的大字报，说他们揭发所党委问题是别有用心。我认为他有毛病，但又觉得很多人对他的看法反映对造反派的偏见。

王昌衡以《风雷激》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梅花欢喜漫天雪》。内容主要是从左的角度对当时院内运动状况不满，但说得比较含糊。这张大字报贴前未经我过目，贴后我也没注意，觉得不算什么很好的大字报，但后来受了很多批判，说是反周总理的。从这张大字报本身是得不出这一结论的。但这样说是事出有因的。如前所述，在9月份，我们对周总理在此97大会上的讲话有些不满。当时觉得是自己不理解，只有些腹诽。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们觉得周总理对造反派支持不够。周总理在小礼堂座谈会上还提过“查三代”。他还说，出身好是一个好，出身和表现都好才是两个好。从反对血统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些提法都是不妥当的，从原则来说是错误的。我们就开始在小范围内议论这些问题。有几位到北航串联时也向北航他们说过对周总理不敬的话。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但又不想和社会上反总理的人，以及院里保守派反总理联络员讲话相混淆，就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提意见。这件事我曾参与商量，拟了一个提纲。但这件事并未进行下去，原因不清，因为我不是负责人。总之当时有些情绪，有些看法。王昌衡的大字报对此有些反映。这张大字报受到一些批评，包括来自造反派的。

院造反派的分裂终成事实。12月，院《革命造反团》内部拉起一个《红旗联络站》，参加的主要有物理所、数学所、政策办公室的造反派，以及声学所、力学所、计算所、微生物所一些人。开了一个成立大会。从会上各所代表的讲话来看，看不出和《革命造反团》领导有实质的分歧。我感到它是对《革命造反团》不满人的集合。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被称为极左派，但有的保守派也参加了《红联》。例如科仪厂的保守派《捍卫十六条战斗队》垮台后，其群众被诬为“焊条队”，纷纷向更左的《红联》靠拢。

对于《红联》领导人拉队伍，搞分裂的事实，我还听过他们的一种解释。他们说，这是为了防止更左的组织出现。在当时，象《全红》、《红总》一类组织不成气候，无法与我们争夺群众。但类似的，或更左的组织未必不能出现，例如有一个什么《挺进纵队》正在酝酿成立之中。也就是说，既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样的组织必然出现，那么，与其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人去领导，还不如我们担此任务。这正如刘少奇先生所说的，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

《红联》领导人自命为《革命造反团》中的一派，所以与该团领导并未发生正面的冲突。但他们确实想分裂，所以刻了两个章，一个是《革命造反团红旗联络站》，供一般用，另一个只有《红旗联络站》几个字，供对京外单位用。

《红联》办公室设在我所，底下设几个组。我参加了“接待组”，任务是接待外单位来访，主要是我院京外单位，还给到外边串联的人寄材料。串通热潮退后，来的人不多了。我又参与了《红联》办的一个不定期铅印小报《红旗评论》的工作。

我自己对《红联》并未全面的认同，对其决策也未起任何作用，但我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因为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主要观点一致。这观点就是，文革以来的分歧，不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根本性的分歧。这一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和未来。我们认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谁也未能很好地阐述。我们这一观点在当时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1967年《人民日报》有一篇“49社论”，说造反派和保守派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公开反对这篇抹稀泥的社论，引起很多人对我们不满。

十四

到了12月初，社会上出现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很奇怪，这潮流来自左右两方。左的方面，如科大《雄狮》。这组织的领导朱军，本是我们四清工作队的，和我很熟，文革初期和我串联过几次。我知道他的思想是造反派的，但不知为何反江青。还有地院《东方红公社》的朱成昭，也是反中央文革。他们似乎都被抓了。他们反中央文革的原因我不清楚。

北京林学院的李洪山似乎是从右的方面，即保守派的立场来反中央文革的。

一天晚上，我到林学院去看李洪山在一间教室里和别人辩论。大部分人不同意李洪山的观点。他们似乎都是外地来串联的学生。他们都很年轻，看来主要是中学生。辩论是激烈的，针锋相对，但无人身攻击。当少数辩论者给李洪山扣什么反革命的帽子时，立刻遭到众人的反对。我是不同意李洪山的观点的，认为他代表保守派的利益。中央文革不是不可反，但当前反没什么道理。但我也和那些红卫兵一样，认为他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我也深感到目前这种民主空气之可贵，认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果。

12月初，我和所里一些人出去串联。科学院不是学校，我们不是学生，至少不是一般的学生，本不应串联。但周总理到了科学院以后说发现这儿很像学校，所以一些人就觉得串联有理并予以实行。我热衷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没有外出。但朱振和出去了。到了12月初，中央有精神不叫串联了，我所有的人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以后就出不去了，再说天气也快冷了，于是寻机会串联。

我们室的几个人找我一起出去。他们从我所管外地红卫兵串联的人手中找到到武汉去的票。这票本是给那些住在我所的外地红卫兵叫他们回去的。我们一共十来个人，其中有几个是我较好的朋友，包括高振、聂玉析、许祖彦。还有一位黄立成，是一位实验员，东北人，很豪爽。

车上当然很挤，但我们也不在乎。我是第一次去很远的地方，感到很新奇。晚上车到了河南安阳，黄立成他们打听到在这列车后有一次到广州去的车，就提议改去广州。于是我们就在安阳站下了车，换乘去广州的车，也没有人管。当时就是这样乱。到了广州，也没人验票。

下了车，我们自然直奔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因为是一个系统。当时像我们这样去外地串联的人还不多，分院的人不识我们的路数，不敢得罪，只能接待。我们住在分院，每天到各所串联，还应邀请了几次京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我没讲。他们几个虽然不算造反派，至少那时不算激进的造反派，但他们完全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宣传的和我们的观点并无不同。分院的运动还基本没搞起来。有一些人来找我们，大多是普通群众。他们最大的疑问是：我们这些既非党团员又非积极分子的人能造反吗，能成革命先锋吗？我们说能。

我们就这样进行了几天“革命活动”。分院领导可能希望我们早点走，况且

已明令不再串联。他们给我们买了回程票。我们在最后一天进行游览。我去的是越秀公园。当然，我们还一起去瞻仰了黄花岗72烈士墓。我们有这样的意识。或者说，想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来主要为了“革命”，不应游山玩水。我们看到上海分院的人来此串联，主要是游览购物，向分院领导要这要那。我们对此贴大字报予以批评。

在回程，我们几个人又在湖南下车去韶山参观。我直接回到北京。

在广州的时候，我们已知“彭黄张周”的周小舟在我院广州分院任闲职，不知是第几把手。但我们不知，就在我们来广州的这几天，这位著名人士去世了。

回来后，看到在这短短十来天里，形势大变。全市的保守派组织全被解散。李洪山那样的反中央文革的人全被抓了起来。联动也被公安部抓了起来。借着这个声势，院里批斗了《串联队》的几个头头，借口他们和李洪山有联系。所里面也正在四楼礼堂开大会批判斗争几个对打“反党分子”有责任的人，一致决议把他们开除出党，还胁迫党委同意开除。这当然是不算数的。

造反组织空前壮大。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过右派的人都参加了造反派。

我所造反派还派几汽车的人去支持半导体所的造反派造反。在我不在所时，还派人去支持过植物园。这两个单位都不在中关村，形势发展落后。

显然，局势发展和我原来设想不一致。这里不再有民主讨论和自由发表意见。我想，我原来认为李洪山不一定是反革命是不对的，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观，而当前这种情况，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我在我们战斗组会上进行这样的检讨。何木芝断然反对。但她没说出所以然。我想她和我串联之前的思想也不一致。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她的立场离我们越来越远。

虽然事态发展和我预想不同，但我像所有的造反派一样，为李洪山等人的被批判而高兴，而没有想到既然我们的对手的发言权可被剥夺，那我们自己离这一步也不远了。

到了66年底，67年初，院所两级的领导都被打倒。张劲夫不但被打倒，还被宣布为反党集团。保守派彻底垮台。在这种形势下，造反派如何再“立新功”？

过了年以后，最大的新闻是第四号人物陶铸“揪出来了”，从此“刘邓”变为“刘邓陶”。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大家只是愈感政治之诡吊。大约同一天（1月4日），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也垮台，组长起用了徐向前。也是在这两天，贺

龙成了坏人，没正式宣布，但大家都知道了。难道现在应该像聂元梓所说的那样“上揪”？（下面还有“下扫”两字姑不论）对揪出这几个坏人，我们没什么贡献，但或许还有没揪出的，待我们作出贡献？我们《造反大队》和《红联》的一些领导人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现在的任务是“上揪”。揪谁？他们也有对象。

显然，这一“革命”的性质已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所不同，虽然不能说没有联系。这一造反已背离了反对政治迫害的宗旨。我所接触的一些造反派领导眼睛只看着三司这样的高校造反派，跟他们学，想出风头，成为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我当时当然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

从国家体制来说，科学院应与国务院同级。但实际上，科学院归国务院管。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文革前，从党的关系上，科学院属宣传口，归中宣部管。这自然是奇怪的事。所以后来邓小平说科学是生产力，确实是个革命。但从中央领导的分工来说，科学院归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管。这与上述两种所属关系又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科学院文革前归李、聂两位副总理管，文革中似乎依然。在辩论应地所事件时，风传在6月24日以前，两位副总理有过批示。这批示是什么？院造反派曾去问过两位副总理的办公室。为什么问？如果有批示，两位副总理应负责；如果没批示，张劲夫就是假传圣旨。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批示，张劲夫应为他自己做的事负责。但后来总理联络员叫不要追这件事了。大家就不再追，但总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

到了67年初，在“上揪”的形势下，《红联》一些人又想起了两位副总理，觉得这可能是个突破口，就采取了一个行动，组织了一些人到院部抢来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是历年院党组会议的记录。他们抢来之后，放在物理所，还组织人查阅，企图找出问题。我没有参加这个事件，也一直没见过这个保险柜，只是事后听他们说过这件事。

但我参加过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他们通过同学关系，联系上院部一个《不争春》战斗组。这个战斗组主要由几位院领导的秘书组成，但不包括张劲夫的秘书。战斗组的名称是不与革命群众争功的意思。他们因与“走资派”关系密切，正怕革命群众嫌弃，见有人串联，非常高兴。《红联》把他们和另一些人弄到物理所，分组开会挖掘院里的问题。我只参加过一次小会，是和吴明瑜座谈。吴是

我院政策研究室著名的秀才，不属于《不争春》，认为是有问题的。所以实际上是叫他交代、揭发问题。这个会开得很短，吴也没讲什么问题。但他突然说了叫我们吃惊的一句话。他说，陈伯达同志在6月24日前到过应地所。我听了，赶紧叫他不要讲陈伯达的事，并嘱参加会的其他人别讲此事。事后我果然从未讲此事，直到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倒台后。

原因非常简单。如果陈伯达在6月24日前到过应地所，他就应对镇压应地所革命群众负责，甚至是参加了这一镇压。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装出一副一向支持群众的样子呢？我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所以从不敢说，怕人说我们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也从此知道许多事情不是像说的那样，思想变复杂了很多，觉得我们可能是给别人当枪使。而且看来吴明瑜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那个清理保险柜却没清出什么名堂，后来就停止了，因为发生了更重要的事。

十五

到了1967年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夺权。自从上海“一月风暴”后，显然各级都要夺权。但这时革命的领导力已掌握在造反派手中，要夺的是行政权。

这一夺权也可认为是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切权力归左派”理论的实践。当然不能如此宣传。那岂不是说他们走在中央前面了？我们虽是这一理论的拥护者，可谁也想不到如此的事态发展，因为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已在我们手中，从未想到夺行政权。

所里夺权不成问题，夺得很顺利。保守派《工农兵》早已垮台。曾有一个中间色彩的《东方红公社》也已解散。无人与造反派争权。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几乎清一色是造反派，与《革命造反大队》勤务组无异。

室里夺权有些麻烦。我们室有三个属于《革命造反大队》的战斗组。在这之外还有一个略带中间色彩的《红色游击队》，其领导人是我的朋友聂玉晰、高振。对待保守派，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不同，但在“一切权力归左派”等问题上有分歧。我认为聂玉晰很好，高振人品不行。

室里夺权的那天，我去北京邮电学院听批判胡乔木的大会。之所以去，是因为我们的小报《红旗评论》邀我写一篇批判胡乔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批胡，是

否因胡的夫人谷羽是我院新技术局负责人就不记得了，但很可能是“上揪”计划的一部分。至于北京邮电学院为什么批胡，是否和原派该院的工作组有关也不记得了。我去了，后来也写了批判文章，登在小报上。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为铅字。至于文章内容，我当时就认为是七拼八凑，没什么意思。当时好像非这样不可。

我从邮电学院回所，就听说室里夺了权了。造反派召集全室会议，宣布夺权，成立了勤务组，《红色游击队》被排斥在外。

此事他们事前没和我商量，当然也没和《红色游击队》商量。我听后觉得不妥，认为太仓促了。我分析，如事先和《红色游击队》商量，即使没他们的位置，他们也许能接受。而现在他们肯定有意见。

果然，第二天室里开会，聂玉晰首先要几个人离开会场。这几位都是历史有点毛病的人。这事说明，他们这带中间色彩的组织，对历史有问题的人，比我们造反派要左些，因为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造反派。这几位出去后，聂玉晰批评了昨天的夺权，宣布他们的组织不承认。

于是我讲话。我肯定昨天的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有不足之处。我劝聂玉晰他们不必如此激烈，有话好商量。会后，先在造反派内部取得统一意见。他们也承认昨天做得不好。然后我找聂谈，我谈了对他们组织的看法，并请他们出一人参加室勤务组。这人我建议为聂玉晰，说如派高振恐不能接受。聂玉晰听了我的话，又与他们那一伙人商量，就按我建议的办了。室里夺权的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除聂玉晰外，室里的夺权勤务组成员都是我们的人。原来都是他们那个《欧阳海》的人，后来有人提议加上了朱振和。这是夺权那天下午的事。后来我还提议是否加上一位原来党支部的人，具体如许祖彦，但在造反派内未通过。

院里夺权出了大问题。

当时天文台提出一个院夺权方案：由个所各派一位代表夺权。这一方案引起一些争论，因为很多系统是按群众组织来夺权的。1月21日那天，我所造反派开大会讨论院里夺权问题。当时标榜“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什么事都开大会由群众直接决定。但这种会往往是嚷嚷半天什么事也决定不了。这次会讨论了一下午，还议而不决。我觉得很烦，就回到室里去了。在室里待了一会，忽然听说

上面风向转了，有人建议我们《红联》马上去院里夺权。我和造反派的一些头头都觉得不行，直到吃晚饭时仍如此。晚饭后继续开会。还把《红联》其他所的人请来，主要是数学所的。会上辩论白热化。很多人认为，必须只争朝夕，马上夺权，否则简直是不革命，以前事实证明，不能等院《造反团》那帮领导。这样的话当时很有煽动性。而反对的人，如数学所邓述慧，只能说夺权是应该的，但我们《红联》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能力领导。这时，《全红》的领导邱海平也来了。他说，我们愿和《红联》一起夺权。这样一火上加油，大家劲更足了，也不想《全红》总共有几个人。

在这种形势下，《造反大队》和《红联》的领导人怎么办？如果冷静地思考，谁也不会走单方面夺权这条路。但当时老是标榜大民主，认为有群众支持就不会错，而且是越左越好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是，马上去夺权就成为必然的了。

我本人也是如此。我本来对此深有疑虑，但此时也想，是不是我自己保守了？又想跟大家一起总没错，也就不但没反对，也参加了。

于是，绝大部分参加会的人马上动身去院里夺权。这时，我们室的造反派没忘记前车之鉴，派人通知《红色游击队》，叫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夺权。他们也很高兴地一道去了。

从所里到院部有约三站公共汽车站的路。绝大多数人没自行车。就这样一大帮人呼啦啦走到院部，已是午夜。到了院里，才意识到夺权应为夺印。印有三个。一个即中国科学院大印，二是院办公厅的印，另一个可能是党委的。两个拿到了。第三个印锁在保险柜里。夜里无人值班，保险柜打不开。于是就抬着保险柜回到物理所。好在人多，这不成问题。这一事件，因对时间判断不同而称 121 或 122 行动。与此同时，《红联》《全红》大约还发了夺权宣言。

应该说，这两个组织的领导在半被动的采取这一行动时，并未充分意识到其引起的严重后果。那些竭力鼓吹这一行动的人当然更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想在夺权后再与院造反团商谈。但造反团的反应十分强烈。他们于次日马上宣布不承认这一夺权，并攻击《红联》，造反派的内战开始了。

1月24日，造反团组织夺权。我们预先知道他们要在院部开夺权大会，就安排了相应的计划，在院部安装了喇叭，派了人。在开会之前，我们还阻拦他们将张劲夫从力学所弄到会场。等他们的会一开，这边的人就要求发言。他们当然

不让讲。我们开去的广播车就开始广播。他们的人就砸了我们的广播车。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安在楼里的喇叭就开始广播，因为院里的计划局是我们这一派的。于是会场乱成一团。在两派群众对立的混乱情况下，忽然又杀进一拨人来，原来是另一更左的组织《红总》。他们没参加 121 或 122 行动，因为恰巧他们当时没人来，所以过后也攻击此次行动，表示不承认这一夺权。但到了 25 日这一天，造反团夺权也没请他们参加。于是他们转变了立场。这拨人开了一辆汽车闯了进来，上面站着或挂着几个大汉，都不像善良之辈，无人敢拦阻。他们车上大喇叭喊，因为造反团太欺负人，所以他们支持《红联》，反对造反团的夺权。《红总》的掺和进来更使局面复杂。这一大会在混乱的情况下结束。但造反团也宣布夺权成功，成立了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联夺。

在后几天的内战中，我们不占优势。因为我们在很多所里是少数，一些人声明退出。特别是他们把我们上纲为“托派”，使我们受到很大压力。但凑巧，清华大学也把他们的对立派打成“托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也就解救了我们。我们到外边打听了一下，原来很多单位都因夺权而在打内战，也就觉得我们这样也很正常了。

我不知道托派是什么派，什么主张，但想到我们这样的人可能与托派联系起来，那么托派未必是很坏的人。

我在 21 日晚采取行动的时候本来是持保留态度的。事后回想起来，更觉问题很多。但我认为在这种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不能承认错误。所里大多数人坚持同样立场。少数人站在反对立场。也有人认为造反派终于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该由他们来收拾局面了。

2 月 3 日，科技界在人大大会堂召开大会，周总理也参加。我们预先知道这件事，很怕造反团利用这机会使他们的夺权成为合法。但周总理在会上没提夺权的事。

2 月 14 日，造反团组织很多人围攻物理所，要求交出从院里搬来的保险柜。引起双方群众冲突。后来总理联络员指示，要双方撤退。我们认为他偏袒对方，因为我们就在自己所里，撤到哪里？

2 月 17 日，传达总理指示，说科学院造反派夺了权，没说哪个组织夺的，但要《红联》参加《联夺》。于是这几个所的头头参加了《联夺》。内战停止，

明争变为暗斗。

《联夺》的办公机构设在中关村原西办小院，机构人员来自各所。原来院部人员搞自己的运动，不再参与院的领导机能。《联夺》本身的机构应该说十分精简。但那时业务工作不多。📷

【书讯】

罗征启著《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记》在美出版

作者简介



罗征启 1934年3月20日出生于北京，祖籍广东省番禺县。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工作，曾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团委书记、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等职，1961年调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1964年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1983年任清华大学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1983年9月赴深圳，参与创办深圳大学，担任第一副校长、党委书记，1985年担任深圳大学校长。1989年“六四”后被深圳市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免除公职。1995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现名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2022年4月12日上午在深圳逝世，享年89岁。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三段内容作“代序”，道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危害以及责任者。书中共有十章，涵括了清华文革的三个阶段：即老红卫兵阶段的“红色恐怖”，蒯大富阶段的昙花一现，以及迟谢当政的强势领导。其中，前六篇主要介绍作者的亲身经历，后三篇缅怀师长黄报青和同事徐葆耕；最后那一篇比较有意思，写的是八十年代末，蒯大富刑满出狱后，在深圳向他当面道歉的情形。罗先生政治阅历丰富，思路清晰，观点

明锐，文字功夫好，加上写的都是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所以读起来生动流畅，苦难中带了点冷幽默，其中一些当年的“政治事件”，现在看起来真是荒唐透顶。

——摘自王允方《良知的底线：罗征启《清华文革亲历记》读后感》



推荐语

三十年前接班人梯队的第二名是罗征启，而不是胡锦涛。也许我们原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总书记。……中国陷入今天的僵局，上层不肯改革，底层不敢革命，只有等待政变，不是因为理想主义的缺失吗？但如果你以为中国没有希望了，我想提醒你，六四的发端就是因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之死，也因为另一个理想主义者至死不渝地坚守住了底线。

——万润南

罗征启出任深圳大学的党委书记，开启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试验。一、取消了深大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统战部、武装部，只设一个党办。二、所有党的干部都由有行政职务的干部或教师兼职。三、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和整党学习都不许占用工作时间。四、取消了学校给党组织的拨款，由党组织自筹资金。

——林海

上个世纪 80 年代，罗老师主持深圳大学，筚路蓝缕，大胆探索，将深圳

大学办成改革的先锋样板。只因在政治风波中表示了和平解决的意见，竟然被撤职和开除党籍。在当地党委与其谈话时，罗老师胸怀坦荡，不卑不亢。开除了罗老师这样优秀的干部，这不是罗老师的耻辱，而是那些高高在上，把持权力者的悲哀。罗老师说出了一句有深意的话——贵党好自为之吧！

——张比

在我身陷泥潭无法自拔之时，他不计前嫌伸出援手将我拉上来，帮助我走上一条新路，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罗老师到深圳组建深大，以深圳速度和勇于创新的深圳精神很快办起一座独具特色的新型大学。罗老师的品格和节操，他的才华和思想都曾在我们的时代闪现出耀眼的光芒，也必将在清华史，在教育史，以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孙毓星

【书讯】

赵品华著长篇小说《梅花劫》在美出版

作者介绍



赵品华，女，湖南邵阳市人。出生于1950年11月，1968年下乡，在乡村学校任耕读教师，1975年因病返城。76年招工后从事过营业员和企业会计等职业，84通过自考，获取商学院大专文凭，91年取得全国会计师证书。92年企业倒闭下岗，曾在深圳赛格商业机器公司和长沙华阳消防公司任财务总监，2005年定居深圳。作者从小爱好文学，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国画和书法上也取得不菲的成绩，其作品多次参展并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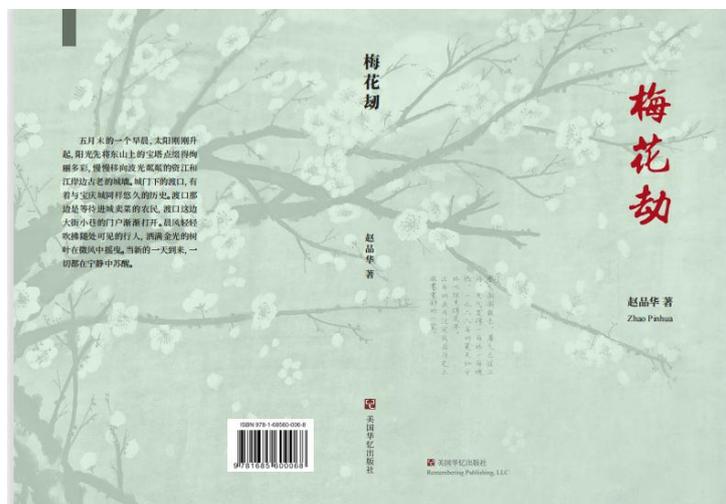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 一 部

- 一、1967年的宝庆城 1
- 二、5月28日的武斗现场 5
- 三、李欣被判处死刑 12

- 四、孔祥三的疑惑 18
 - 五、朱有良的政治陷害让李家遭遇不幸 21
 - 六、孔祥三去桃花镇调查李欣案件 34
 - 七、朱老大黑心昧下金梅花 43
 - 八、白素玉上京为儿子伸冤 51
 - 九、孔祥三设计让李欣保外就医 53
 - 十、李欣孟柯同是天涯沦落人 58
 - 十一、孟柯帮助李欣越狱 61
 - 十二、孔祥三成立李欣专案组 67
 - 十三、李欣成功逃往香港 71
 - 十四、李欣案件让孔祥三有了危机感 75
 - 十五、朱有良陷害孔祥三入狱 79
 - 十六、中央信访办 84
 - 十七、拯救李卉 86
 - 十八、白素玉被审讯 93
 - 十九、朱家父子遭遇窃贼驼背 97
 - 二十、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102
 - 二十一、有康惨死，金梅花失窃 106
 - 二十二、朱有良利用权力迫害白素玉 112
 - 二十三、志远的初恋 119
 - 二十四、朱有良乱断李欣案 126
 - 二十五、白素玉结识狱医杨义 131
 - 二十六、李卉的逃亡生活 140
 - 二十七、白素玉生命中的第二次爱情 144
 - 二十八、白素玉认罪 155
 - 二十九、鬼魅宁顺生 162
 - 三十、白素玉之死 181
- 第 二 部
- 三十一、林达生和李欣的遭遇 187

- 三十二、宁顺生的忏悔 191
- 三十三、孔祥三调查白素玉的死因 194
- 三十四、李卉的遭遇 198
- 三十五、李卉被朱有良劫持到麻风村 202
- 三十六、志远寻找李卉 213
- 三十七、孔祥三欲借李卉案扳倒朱有良 216
- 三十八、为探案志远诱惑齐小娟 220
- 三十九、宁顺生孤身智斗朱有良 224
- 四十、李卉失踪成迷案 231
- 四十一、志远醉后吐真言，齐小娟如梦方醒 235
- 四十二、朱有良怀疑杀手是宁顺生 240
- 四十三、朱有良调查宁顺生 244
- 四十四、宁顺生和驼背结盟对决朱有良 249
- 四十五、公安局长方圆调查李卉失踪案 255
- 四十六、雨夜跟踪 261
- 四十七、朱有良定计杀志远 266
- 四十八、杨义吐真言，白素玉冤情大白 270
- 四十九、夜半枪声 274
- 五十、方圆智破李卉案 279
- 五十一、李卉获救 282
- 尾 声 286



第一部

一、1967年的宝庆城

五月末的一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阳光先将东山上的宝塔点缀得绚丽多彩，慢慢移向波光粼粼的资江和江岸边古老的城墙。城门下的渡口，有着与宝庆城同样悠久的历史。渡口那边是等待进城卖菜的农民，渡口这边大街小巷的门户渐渐打开。晨风轻轻吹拂随处可见的

行人，洒满金光的树叶在微风中摇曳。当新的一天到来，一切都在宁静中苏醒。

宝庆城是雪峰山下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它缺的是名胜风景，也没有战争留下的遗迹。交通不发达，物产也不丰富，虽然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护国将军蔡锷，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知名人物，仍然是市民化的飘荡着烟火气的毫无名气的小城。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性情暴躁而倔强，讲话扯起喉咙喊，半里以外都能听见，人称“宝古佬”。“宝古佬”的生活朴素而简单，一生只需完成三件大事：男婚女嫁，生儿育女，给长辈养老送终。所以，在这座城里，红白喜事就是最大的事。居住在城里的居民不是亲戚就是故友，谁家要有个红白喜事都会礼信巴巴的去送份人情凑个热闹，讲究的就是睦亲友邻，长幼有序。和所有民风古朴的小城一样，老一辈维护传统，年轻人追求时尚。自从有了从上海迁来的工厂和随着工厂迁入的上海人，宝庆的伢崽妹崽就学上海人，留起包菜头，穿起喇叭裤，让窄得不能再窄的裤子把屁股包得紧紧的。那些年长的领导们认为，上海人是从资产阶级花花世界里走出来的，留包菜头穿喇叭裤的伢子妹子被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解放十七年，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斗到了生活中的细枝末节。渐渐地，宝庆不再只有男人和女人，长辈和晚辈，人被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类。从此，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人能做亲戚朋友，什么人不能做亲戚朋友；什么人的红白喜事能去，什么人的红白喜事不能去，都重新排序。这是关系到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一不小心成为资产阶级的朋友，也就成了无产阶级的敌人，不光是自己离牢门不远，还会祸及子孙三代，这是很吓人的！要是你光荣加入了共产党，不仅你是革命的，你全家都

是革命的，实在值得自豪。如果把人际关系比喻成一条生物链，共产党员们肯定处在生物链的顶端。

寒气渐渐散去，暑气已经上升，天气变得一年比一年燥热，1966年的夏天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早。这年的5月注定成为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这一刻起阶级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人们不但冲上大街把那些包菜头、小脚裤统统剪掉；就连祖宗留下的牌坊和街道名称都受到质疑，没有革命性的统统清除；庙宇寺院天主堂被打个稀巴烂；大字报，大辩论如飞来横祸让人无法招架。

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再沉默，向政敌们开炮了，他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现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睡在毛主席身边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很快被揪出来了被打倒了被送进了监狱。刘少奇的左膀右臂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被打翻在地，有的甚至被打死了。那些被安插在党界、军界、政界、文化界的虾兵蟹将被揪出来了，成了黑线人物，革命群众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按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经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目标就实现了。由于中央文革特别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革命群众和反革命分子斗争的继续。这句话的严重后果是，手执木棒和铁棍的革命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毫无理性地疯狂打杀反革命。广州一天就活活打死几十个五类分子。天子脚下的大兴县，一天杀了好几千地、富、反、坏、右。他们本来就是死老虎，再补上一刀，让他们死，才是继续革命。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黑帮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等，只要罪名有了，也可以随便打死随便处置。他们中有的惨死街头，有的被迫自杀，这事让整个中国人诚惶诚恐，失去安全感。要打倒一个人，要把白的说成黑的，只需要给他们定个名分就行。文化革命初期，那些挂牌子游街的人。牌子上怎么写，罪名就跟着定下来了。古有：“莫须有”，今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譬如：蟑螂是螂，螳螂也是螂，螳螂螳螂就是一家亲，小鸡有翅膀，小鸟也有翅膀，它们就是夫妻，不认账也不行。推翻一切常识，抹黑所有逻辑，混淆是非黑白，失去

正常理性只为继续革命！就像“造反有理”，它成了一面旗帜在新中国的土地上高高飘扬，只要造反就有理，无须前因后果。“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宝庆市虽小，整起人来毫不逊色。因为继续革命，因为造反有理，宝庆市的市长们，市委书记们，部长们局长们及各级党委书记们统统罪该万死被打翻在地，在工厂连车间主任都被揪上了批斗大舞台。红卫兵们写大字报，开斗争大会，给“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政治无底线，人权的底线也没有了。权力斗争总是居心叵测，手握重权趁机以革命的名义公报私仇的大有人在。那些与人结过仇的或不知不觉中得罪过人的，如果手中无权，那就任凭命运沉浮了。你敢说文革运动不是由某个领袖为打倒另一个领袖而发起的吗？

据说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是先知先觉，学生们是开路先锋，可惜这些读书人，革命刚刚开始就找不着北了，多半成为阶下囚。工人阶级虽然后知后觉，却能坚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1967年红卫兵小将们完成了冲锋陷阵以后退居第二位，工人阶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队伍扩大了，思想也变得有点复杂，人们的确有了不同的政治爱好和利益取向。XX是罪该万死还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是该打倒还是该保护，不再是吵吵闹闹的表象，而是权力的象征。涉及派别的利益。各派别都奋起保卫一个与他有着利益关系的当权派，打倒另一个与他争权夺利的当权派。起初在大字报上表明观点，后来用大辩论凝聚同党，党同伐异，再接着是互相打起来。两种不同的观点，很快变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文化革命成了与文化无关，与权利密切相关的你死我活的战争。

政府机构瘫痪了，但政治阴谋还在继续。各种阶层，各个组织，各种派别，各个团体，各种单位以及各个家庭此时此刻都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两种观点，两个阵营。本来都是平头老百姓，讲话顶个屁用。各个派别都是一张琴上的弦，弹琴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让谁发出声音，谁才能发出声音来。

但是已经斗红眼的人见了面不是打就是骂，满街都是群众斗群众。你打倒我，我打倒你，全面内战正在展开。

1967年，街头上时时响起枪声。可怜的母亲为孩子担忧了：我的孩子现在在哪里？他在和人辩论吗？正在被人围攻吗？在和人武斗吗？在打仗吗？今夜他会不会回来？

【资料】

关于革命领导干部吕应中同志材料汇编

（内部参考，请勿外传）

清华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正确对待干部》战斗组 1967.11

最高指示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目录

- 一、我们对吕应中同志的基本估计
- 二、吕应中的简历、家庭及社会关系
- 三、1957年6月4日在物理教研组的发言
- 四、吕应中与旧北京市委的关系
- 五、吕应中与蒋南翔为首的前党委的关系
- 六、北大社教与清华假社教
- 七、关于吕应中参加黑帮核心组会的初步调查
- 八、吕应中对待毛泽东思想言论

团派《1042》战斗组整理

一、我们对吕应中同志的基本估计

吕应中同志现年41岁，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家庭。1948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系地下党）。50年于清华毕业后，曾任教务处教研科长，科学处科研科科长，到文化大革命前任工程物理系×××专业教研组长、副系主任、清华试验化工厂党总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等职，59年起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家庭及社会关系见附件二）

了解吕应中同志工作情况的人普遍反映：十几年来，他一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充足的革命干劲。对党交给的任务，能够做到知难而进。在院系调整后的教改、建立新专业、建造试验化工厂、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在困难条件下，表现出强烈的革命精神。

吕应中同志本人生活也比较简朴，不特殊化。他翻译（翻译工作是业余时间做的，对解决新专业教材起了一定作用）所得的稿费，除他爱人生活用去几百元外，其余的6000余元全部交了党费或交工会作为职工的困难补助费之用。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吕应中同志的表现都比较好。

解放初期，在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学校领导权、反对教授治校的斗争中，吕应中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当时在教务处、科学处均与右派份子钱伟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领导各系党员系秘书（当时没有系党总支）开展工作，在与各系资产阶级教授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吕应中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号召，在学校中坚决反对钱伟长之流教授治校的主张，积极促进教学改革的工作。但是，他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对解放区教育毫不了解，由于没有能识破刘少奇、蒋南翔等一小撮，借学习苏联为名，行扼杀抗大式学校之实，搞全盘苏化的阴谋。在工作中盲目跟着蒋南翔，不加批判地全盘学苏联，把修正主义的一套搬进了清华，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

在肃反运动中，吕应中同志立场鲜明，在他负责的外语教研组（当时在学校是一个政治情况复杂的单位），放手发动群众，揪出了5个反革命分子。

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吕应中同志在校外实习，5月27日回校，当时校党组织瘫痪，他没有得到党委任何指示。6月4日参加了基础课物理教研组的一次

鸣放会，由于对形势认识不清，对工作做了一些检讨，做了有右倾错误的发言。

（见附件三）这个发言被右派利用来向党进攻。但他对右派的言论是反对的，后来很快认识到右派在向党进攻，6月8日作了（原文不清）起来坚决斗争，在和清华园的大右派钱伟长的斗争中他是坚定的。

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鼓舞下，也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激励下，吕应中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伟大号召，领着一批几乎毫无专业知识的年轻教师、学生和工人，提出了要做“阶级斗争战士”“建设祖国×××事业的春天”的口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做马粪纸模型开始，着手筹建××××××。从上马开始，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吕应中同志注意紧跟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著作办事，比较注意政治挂帅和发动群众，注意科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经常引导群众把具体的科研生产任务和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激发起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怕艰苦地完成任务，在任务紧张的时候，首先注意抓政治鼓动，同学们曾经编边了“艾森豪威尔访日本”等反美国活报剧，来鼓舞斗志。经常教育群众做普通的劳动者，通过群众辩论，批判了“集体放卫星，个人当来伊卡”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出了“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树革命的事业心”，经常号召群众要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工作。群众根据主席教导，分析了×××，发现它也是纸老虎，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许多技术问题迎刃而解。他反对专家路线，反对少数人冷冷清清搞科研，主张大搞群众运动，他反对迷信洋人，反对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一再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后又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赶”“超”的口号。吕应中同志能够身体力行，大部分时间在现场和工人教师学生住在一起，参加设计与现场施工的部署，并参加一些劳动。

59年国内及校内都刮起了一股右倾风，右倾机会主义者要否定党的三面红旗。但吕应中同志坚持了党的路线与党的教育方针，顶住了这股歪风，进一步发扬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在有些人走回头路的时候，在二机部的一些国内外“专家”们的反对声中，他提出了要建造“零功率某某某”等新任务，在有些人要力图恢复旧教学秩序的时候，他提倡“教师教学生，学生教教师”以及“结合任务学课程”的“新型”教学方式。八届八中全会前后，他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政治上坚定的，但是由于当时对待蒋南翔等一小撮的右倾机会主义

本质没有认识，所以也执行了旧市委和旧党委在反右倾斗争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即在学校中大抓所谓“新富农”），吕应中同志也批判了某些具有错误观点的基层干部的群众，矛头向下，压制了不同意见，从而帮助了蒋南翔加强了对党员的控制，压制他们的造反精神。

在苏修反华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吕应中同志始终坚信三面红旗，坚信党的领导，正确理解八字方针，尽管当时有许多困难，本人身体一度患病，但他精神基本上是振奋的，工作积极向上，这与有些人动摇、消极、颓废形成了极明显的对照。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国防科研方面，大搞取消主义，大刮下马风，而吕应中同志却坚持认为×××××是国家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并没有被这股歪风吹倒。这样吕应中同志和群众在一起，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继续为国家建设×××基地而努力，并通过建×××成长了一支专业队伍，准备了以后跃进的条件。

61年刘邓黑司令部批发了《高教60条》，蒋南翔欺骗干部说这个文件是毛主席同意的。吕应中同志路线觉悟也不高，没有能认识其修正主义实质，以为方针政策没问题，但是对《60条》中削弱党的领导，恢复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位；取消学生劳动；否定前两年教育革命中取得的成果，恢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纯课堂教学；提倡“填平补齐”助长业务第一、理论第一和个人主义，……等等是有不同意见的。

蒋南翔、何东昌（前党委副书记）主张教学要以“理论为轴心”，提出在学校中应该是“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吕应中同志自58年来对此一直持有不同意见。他提出了“在战斗中成长”，“见人见×”的口号，并坚持了58年后教育革命的一些成果，为此引起何东昌的不满，后来，1964年何东昌抵制毛主席春节指示，在教务处订了一套不许革命的“条例”，吕应中又背着何东昌反对这些“条例”，搞了一些教学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没有触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要害，现在看来仅是一种改良，但是它反映了当时吕应中同志对待春节指示的态度与何东昌之流是相反的，对现有教育制度是不满和力求改革的，并实际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在他听到65年底毛主席与哲学工作者谈话的传达之后，就努力体会主席指示的精神，着手总结几年来教改的经验，可是这份总结后来却被蒋南翔用来装潢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吕应中对现有教育制度的某些不满还反映

在他反对现有留苏的研究生培养的道路是“本本第一，个人奋斗第一，论文、学衔第一，脑力劳动唯一”的道路。在蒋南翔、何东昌亲自狠抓因材施教时，规定每个专业要选拔几个“尖子”多学数理化，吕应中同志却要求这些同学去工地多参加一些劳动，在劳动中锻炼成长，抵制天才教育。

64年中央号召学习大庆时，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并未贯彻执行，但吕应中同志在200号却较积极地贯彻执行了，特别是领导广大群众按毛主席指示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号召“摘掉×××事业落后的帽子”，因而工作出现了新的跃进，在当年国庆节前，零功率×××及屏蔽实验室×××先后建成投入运行。在×××建成之后，吕应中同志没有故步自封，立即组织主要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一方面总结了六年的经验。一方面提出要寻难而进，争取挑重担子，主动为国家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所以从65年先后研究了××、××、××的设计和实验。吕应中同志在选择这些任务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是本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原则，体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具体工作中能从国际上尖锐的阶级斗争出发，立足于“打”，能比较自觉的与其他人在国防科研工作中所推行的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些任务上的反映做了斗争。

66年5月-6月吕应中同志作为中国高教部科学技术代表团的一员，去英国考察×××事业，在出国考察回国总结的过程中，吕应中同志政治上是坚定的，业务上也做了一定贡献。

但是由于吕应中同志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了家门就进校门，没有深入过工农群众，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因而在蒋南翔统治清华时期犯了许多错误。他的主要错误是：

1. 吕应中同志几年来存在许多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尤其是对要大抓学习“老三篇”、突出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认识不足。虽然他主观上努力在科研工作中运用、学习毛主席思想，并提出过反对“资产阶级科学拜物教”等正确的口号，但是过多地、片面地强调在业务领域中的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及学习方法论、认识论去掌握客观规律，犯有“政治落实到业务”的错误。例如，65年学习王杰运动时，吕应中同志提出“一为三不做”的口号，即“为

人民，不做洋人的奴隶，不做自然的奴隶，不做旧习惯势力的奴隶”，这个口号抽去了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核心即破私立公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的问题。在刘邓陆蒋等一小撮走资派挥舞“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棒，压制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吕应中同志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不支持群众挂语录和学语录，不支持“天天读”。甚至有一次在讲党课时还传达了旧市委散布的，借一个团支书淹死的事，污蔑群众学毛著“死学死用，学死用死”的一段话，和他听到的其他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话。这样，吕应中同志有时不自觉地成了刘、邓、蒋之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传声筒，在群众中起了很坏的影响。

2. 中了刘氏《黑修养》的毒，忽视了阶级斗争，忘记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没有弄清在教育战线上，特别在清华大学党内还存在一小撮走资派，更没有认识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反右以前，吕应中同志还比较注意党和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学校领导权的斗争，反右以后，蒋南翔宣扬：“现在党的领导权的问题解决了，今后主要要在业务上超过钱伟长他们。”吕应中同志接受了这套理论，于是把几乎所有的精力转移到攻尖端上来，走了一条重业务、轻政治的道路。64年之后蒋南翔惊恐万状，千方百计歪曲主席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硬说“清华工作方针、路线是正确的”，“清华成绩是主要的”，“清华是高教战线的大庆”，“清华和大寨一样是一二类的，不存在夺权问题”等等，吕应中同志相信了这套鬼话，他把蒋南翔看作是党的化身，处处紧跟“南翔精神”，对蒋南翔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毫无认识，从而犯了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吕应中同志和广大群众一起苦干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如×××的建成），经验总结（如《六年的奋斗，四个方面的丰收》和《×××专业八年教学小结》等）都被蒋南翔用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资本，维护其对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吕应中同志对此阴谋未能察觉识破，因而工作起来十分积极，结果是越“积极”起的坏作用越大，例如吕应中同志为66年高教科研展览会上展出×××××出了不少力，自以为是为了“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自力更生的科研道路”，但客观上却是为蒋南翔、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涂脂抹粉。

3. 由于吕应中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他对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没有认识的，对高教《六十条》的修正主义实质也是没有认识的，尽管在局部问题他曾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但就总体来说，旧的一套和他的

世界观是比较吻合的，他所贯彻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是蒋南翔的一套，他所贯彻的阶级路线基本上是所谓“重在表现”的彭式阶级路线，并且积极地宣扬清华成绩，维护全日制多科性工业大学。他对工农同学不够关心（突出表现在对物407班的态度上），不重视和工农相结合，不积极支持同学去农村参加社教运动，反而提出“在实验室中也可改造世界观”，“实验室中也能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的错误口号。吕应中同志本人以及他引导同学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工农、脱离劳动的“三脱离”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64年底全国理工院校教学会议上，许多同志严肃地批判了高教《六十条》，吓得陆定一、林枫、蒋南翔等亲自出马压制批评，会后又组织了会议参加者参观试验化工厂，想借建成试验化工厂的成绩掩饰他们在教育战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蒋南翔通过何东昌向吕应中布置，在参观介绍时要强调一下从积极的方面理解《六十条》。吕应中同志认为陆定一代表中央已经肯定了《六十条》，所以在介绍时，执行了蒋、何的指示，客观上吹捧了修正主义纲领，帮了陆定一、蒋南翔一伙的忙，起了很恶劣的影响。

4. 由于吕应中同志对蒋南翔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没有认识，所以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不自觉地不同程度上执行了旧市委和旧党委一小撮所制定的反动路线，客观上迎合了蒋南翔之流“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阴谋。例如在59年反右倾中，蒋南翔提出打击“新富农”，吕应中打击了一个党员教师赵某某；63年五反时执行蒋南翔之流的指示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导到去解决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65年初在党委一小撮的指使下，全校搞党员清理思想，形“左”实右，去整一般的党员，实际上是执行蒋南翔之流抵制社教运动的计划；吕应中也忠实地在200号工地执行了这个计划……等等。

5. 吕应中同志由于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怪，所以他不能根本改变轻视工农、轻视群众的恶习。虽然在200号工地上，教员、实验员和工人之间在政治、工作、生活方面的差别比学校其他单位要小一些，但仍然有较大的差别。吕应中同志只重视少数他认为有“才能”的人的意见，对于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工人师傅是不够尊重的，较冷淡的。工人同志反映吕的官架子很大，生活上对有些群众的合理要求照顾不够，工作中很少注意发挥工人师傅在科研中的积极性。即使在教师和干部中也不是平等待人，而常把自己看作是党委的代表，常常独断专横，

排斥压制不同意见。例如在对待陈××同志及李××同志的问题上都存在错误，由于他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有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资产阶级观点没有很好改造，所以使他在工作中主观上愿意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走群众路线，大搞辩论运动，而在具体执行中常常犯有许多错误，对群众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常常有所暴露。

6. 吕应中同志虽然在反对三建某些领导产值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反对×部某些人墨守成规、爬行主义的过程中表现了应有的原则性，但在工作中也常常暴露出他严重的本位主义和风头主义，尤其是六四年×××建成之后更为严重，自高自大，尾巴翘得很高。他看不起有些兄弟单位，有时还在群众面前错误地贬低兄弟单位和夸大取得的成绩，借以抬高自己，有时则把彼此间不同意见不恰当地上纲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兄弟单位交给的协作任务不太积极，而对别人为自己服务时要求却很高。例如66年×部×所委托我们完成屏蔽实验的任务，由于吕应中同志认为该实验的意义不大，自己的方案比别人先进，所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方案，仅安排了少数人搞协作任务，只要求按时完成任务就行了。这些说明了他在工作中夹杂有使清华和本人一鸣惊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动机。

吕应中同志缺乏工农感情，不注意爱护国家的财产，又听不进群众意见，自以为是，瞎出主意，加以缺乏经验，所以在施工和设计中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浪费和积压了部分物资。群众和上级对此提出批评后，吕应中还不能虚心接受，常常说：“要算政治账”，“我们是战略上节约，战术上浪费”，以此抵制批评，不愿好好触及灵魂，认真地检查。尤其严重的是，66年初三查运动中，吕应中同志害怕领导发现他工作中浪费严重的现象，向工地干部和群众做了层层布置，掩盖真相，隐瞒错误，欺骗领导，抵制三查。这是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次暴露。

吕应中同志对国家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如卫生防护制度等等）不够重视，有时为了怕上级部门“干扰”或贪图方便，采取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包括弄虚作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曾经用一个实验室的名义去订购另一个任务所需要的设备；又如61到63年曾派出许多同志到全国各地跑材料（当时全国有这股风），盲目抢购，违反了国家计划……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在工作中吕应中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产生了不少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

文化革命开始之间，吕应中同志正好出国，当他回到清华时，刘邓派的工作组已进校十多天了。工作组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对干部进行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吕应中同志一回到200号工地就被带上了高帽子，游街斗争。在工作组的指使下，许多事实被歪曲夸大，再加上不少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无限上纲”，就把吕应中同志打成了“土皇帝”“大黑帮”，从那时起，到今年七月中（红旗评论员文章发表三个月后）一直被实行“专政”，进行“劳改”。还在很长时期内不许看大字报，使吕应中同志长期与群众隔离，不能和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段时间内，他醒悟较慢，对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很不理解，对群众运动很不理解和对蒋南翔等一小撮迟迟不能彻底划清界限。

例如66年12月份，他受到了刘冰等人的影响，在工地菜窖“劳改”时向同时劳改的干部说过一些保蒋性质的错误言论。在言论中也流露出感到委屈和不服气的情绪。

直到67年《红旗》第三期社论发表之后，一开始还只承认清华的某些工作是修正主义的，后来在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教育下，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蒋南翔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但是即使到目前，他的认识也还很不深刻，三划一站做得不够好，对待200号工地有些群众对他采取的过火行动感情上还有些抵触。

然而，即使在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吕应中同志始终没有动摇他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

66年6月回国后，他在知道自己被打成黑帮的情况下，仍能以极认真的负责的精神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写好出国考察总结，后来在66年10月到67年初之间吕应中同志还被“专政”“劳改”时，出于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热爱，出于对国防任务的焦急心情，曾先后六次写报告和信件给当时200号工地厂文革的负责人，汇报了自己对国防科研任务的看法，对某几项具体工作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参加一些具体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还很深，结果吕应中同志的这一革命行动反被某些人说成是向革命派“夺权”，从而罪上加罪，完全剥夺自由，使他再也不能发表意见。

67年7月以后，在井冈山414的革命小将帮助下，吕应中认识到自己不能

再闭门思过，坐等“定性”，决心杀向第一线，大造刘、邓、蒋的反，他检查了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犯的错误，拿起笔写了许多批判刘、邓、蒋的文章和大字报，并且积极准备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大会。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大地鼓舞了他，激励了他的革命斗志，他主动地到群众中去做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他学习了王少庸、姚力等同志敢于革自己“私”字的命的精神，决心到对自己意见最大的群众中去，尤其是到要打倒自己的群众中去，他多次到要打倒他的群众中去，虽然被坐了喷气式，晒了太阳，背上被贴了条子，赶出房门等，他仍然坚持去。目前 200 号的群众已经多次组织了对他的批判帮助，吕应中觉得收获极大。现在吕应中说，“斗批走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不想走，我在 200 号犯了错误，跌了交，我总结犯错误的经验，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批判，能使我们以后更好的工作，我一定要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一辈子。”

吕应中同志在蒋南翔统治的十几年中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许多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我们从各方面调查了与吕应中同志的全部历史及全部工作，我们认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是努力去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和蒋南翔、旧市委等一小撮除了工作关系外，没有任何黑关系，他是犯有路线错误的干部，但他不是反动路线的制定者，而是执行者和受害者。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又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结果。他犯错误还由于中了《黑修养》的毒，忽视了阶级斗争，忘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接受了刘少奇的奴隶主义的结果，同时也是受了旧市委与蒋南翔等一小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蒙蔽的结果。吕应中同志所犯的错误的人民内部矛盾，对他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要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热情地帮助他做好三划一站，要给予机会让他在文化大革命及抓革命促生产的过程中建新功，立新劳。

总之，我们认为吕应中同志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我们就是要应该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

以上就是我们对吕应中同志的基本估计。

【附件一】**一、吕应中简历及社会关系⁶⁸****1. 简历：**

1926年6月24日 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1938年到1944年 在四川江津中学读书

1946年10月到1950年8月 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读书

1948年10月 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加入中共地下党，介绍人赵葆元（吕同班党员，现在北京）

1949年12月 转正，转正后补期延长两个月

经调查，吕应中同志入党问题是清楚的，手续是完备的。当时清华地下党组织分南、北两个系统互不联系。南系为46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迁来部分，归中央青委领导（在北京的负责人是刘晓，在清华的负责人有荣高棠）。北系为原留北京部分归北方局、北京城工部领导（系彭真、刘仁系统）。吕应中是由同班党员赵葆元介绍加入南系党组织。转正时后补期的延长据本人说及调查当时的负责人反映原因是思想作风上有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大。无其他政治原因。

1949年 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青年团团委委员。

1950年9月到1952年8月 任清华大学机械系助教，教师党支部委员，后任支书。

1952年8月到1955年 任清华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后期任清华党委委员。

1955年到1958年 任科学处科研科科长，兼任科学处党支书。

1959年起至文化大革命 任清华党委常委委员。

1958年到1963年 任工程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后任副系主任，61年后提升为副教授。

1963年到1966年 任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副厂长，总工程师，试化厂党总支书记。

二、吕应中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⁶⁸ 吕应中的爱人的妹妹据吕本人说在外做地下工作，无法调查。另外吕应中爱人的嫂子的哥哥是肖前，吕应中听说过，从来无有来往。

1. 家庭:

父 吕 澂 江苏丹阳人，现年71岁，无党派，无宗教信仰，全国政协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早年教书1922年到1952年一直在一个私立的佛学研究机构中研究佛学，1956年到1961年左右，在南京参加编写佛教百科全书。

母 吕 怡 无党派，无宗教信仰，原为小学教师，结婚后无工作，1942年去世。

弟 吕应三 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党员。

弟 吕应运 现清华大学试化厂。

爱人 陈槐庆 清华大学外语教研组教师。⁶⁹

2. 社会关系:

大伯父 吕凤子 无党派，解放前一直教书和办学校，解放后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1960年去世。

堂兄 吕去疾 一直教书，现任江苏丹阳师范学校校长。

吕去病 解放前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解放后在东北沈阳某工厂任总工程师级的职务。

吕去痴 一直教书，现在江苏金坛中学任教。

吕去癖 江苏医学院教师。

堂姐 吕无愆 一直教书，现江苏师范附属女中任教，她丈夫参加过国民党，59年被揭发，是历史反革命，被管制，前几年已病死。

吕无咎 原为教师，解放前夕同其丈夫逃往台湾，她丈夫孙世笃解放前在国民党兵工署做事，吕应中只是来清华上学前见过一次后一直无联系。

二伯父 吕中林 无党派，已去世。

四叔父 吕 濂 无党派，医生，已去世。

五叔父 吕 沅 无党派，医生，已去世。

大姑母 吕允农 家庭妇女，丈夫景亮钧是律师。

⁶⁹ 吕应中的爱人的妹妹据吕本人说在外做地下工作，无法调查。另外吕应中爱人的嫂子的哥哥是肖前，吕应中听说过，从来无有来往。

二姑母 吕菊子 家庭妇女，丈夫温晋城：国民党员，曾任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师辉的秘书长，解放前全家逃亡台湾。吕应中与他仅在47年见过一次后，无任何联系。温晋城逃往台湾后，吕应中的家庭与温没有联系过。

【附件二】

三、1957年6月4日吕应中在物理教研组的发言

此发言大字报是右派分子董曾南利用吕应中的发言向党进攻时将会议的记录抄成的，57年5月底吕应中刚从外地实习回来。是在对学校情况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讲的。这个讲话是右倾的，被右派分子利用。6月8日，他就认识错误，做了检查，投入反右运动，在和大右派钱伟长的斗争中表现坚决。

党委委员周寿昌、吕应中的发言

（按1957年整风时照片抄录，有不清处空白）

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在6月四日晚上召开教研组□□□□□□□□同志继续揭发清华党工作的“三害”，并进行很多的分析□□□□□□□□。许多同志就目前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提出了意见和问题，有的同志说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感到有些上下内外不□□□□□，下面群众贴了许多大字报，上面党委对我们看法如何，估计如何，外面的报纸也不登载报道，对我们的做法究竟怎样看法，党委虽对学生做了报告，但这些报告并没有解决群众的这些□□□□的疑问。有的同志说，到现在提出这么多意见，党委□□认为是基本上正确的，是可以考虑研究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有无作用？有的同志说：现在有（缺十几字）……党委吕应中同志说，我说不上代表党委会表示态度，但是可以表示我自己的态度。这次整风中，物理教研组提了很多很尖锐的批评，我认为不仅对工作有帮助，而且对帮助党委认识这些问题也有很大帮助。总的说来，这次党委领导整风，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能不感到一些被动，因为一方面要领导这个运动，另外一方面还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展开自我思想斗争，我想党委在这次运动中是一个受教育和改造的过程，接受多方面的意见，也不是都轻而易举的，而

有时是需要一些思想斗争和一定的认识过程的。比如说上次蒋校长在物理教研组最后的发言中有一部分受到大家欢迎，但也有一部分（约缺15字）……不满。他说，他来清华后，主观上一直是尊重老教师的。当场就有同志问，既然校长上哲学时说动机与效果有一致性，为什么有尊重的动机而却有老教师感到不受尊重的效果呢？我自己对这句话也是不同意的。我认为检查一下过去对“尊重”究竟具体如何认识才能找出改进清华党群关系所在。然而对蒋校长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任何批评意见要被深刻的认识和真正接受，是需要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的。最近常委会开会气氛与以前大不相同，会上争论很多，有时各说各的，甚至同时都说，鸣成一片。常常在具体意见上不容易很快得出结论，这说明党委在整风中内部也是一个矛盾和斗争的过程，这是必然的现象，当然在大鸣大放这一点上，党委内部是一致的。我所说的只是对待具体问题的观点，这是必然会有矛盾的，（缺数字）……，在……物理教研组的会上，有些同志引用了听见和传闻的个别同志对某些具体批评不表支持的发言就产生顾虑，就认为党委是否有决心放，我认为不仅是批评可以允许不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个别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具体意见，思想真正搞通，有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发动群众请大家来大鸣以帮助整风，正是因为不□□则领导人可能感到压力不大，或思想不（约缺20字）……也是正常现象。我们绝不因此而不放不鸣，相反都应该大鸣大放才能促其清醒。大家所提的意见，与我过去工作有关部分，我感到绝大多数非常中肯和深刻，例如对教务处工作中搞三年总结，提规划等形式主义的批评，我自己从调到教务处，开始认识得比较（缺数字），……现在大家提的很尖锐，（缺数字）……也进一步检查，的确教师力量究竟如何看才恰当？这过去领导上安排是有缺点的。比如科学处的同志一直认为科学研究上过去开展还不够。另外如何成钧同志刚刚讲了一句话：清华领导上提拔了干部也不教育，就偏听偏信，对□□□□□我也有同感。的确回顾几年来自己担任一些工作中领导极少做检查，更少批评教育，在领导机构如常委会中批评自我批评（约缺十几字）……错误缺点不发展起来！因此我觉得同志们提了绝大多数意见都是很有启发性、很深刻的，当然有极少数意见还可以讨论□□□，成绩和缺点的认识与估计问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

（周寿昌发言略）

四、吕应中与旧北京市委的关系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旧市委搞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扎不进的独立王国，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刘仁是这个集团的第二个大头目。

吕应中和旧市委是否有特殊的关系，是给吕应中定性的重要症结之一。

我们根据群众以前揭发的材料，经过初步调查核实后，公布以下的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说明吕应中和旧市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我们也到刘仁档案组进行调查过，未发现有什么特殊关系。

下面将这些材料公布如下，提供同志们讨论时参考。

厂址选择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为了搞独立王国，提出要建在学校附近（根据公安规范离开生活区 1km 的要求）。厂址开始选在后八家村，报北京市规划局，经二部苏联专家总顾问同意后，于 1958 年底开始基建。59 年初，何东昌说刘仁传话，某厂出了安全问题，为了北京市的安全要求，把厂址迁到别处，根据市规划局的意见，在昌平（不是目前的厂址）及××两处选方案，但都不合条件。后刘仁建议选在目前的地方，并说这地方与北京市的规划没有矛盾，此地风景又好，电影《智取华山》就是在这里取景的。选择了目前厂址后，规划局还有意见，一时不能定案。蒋南翔找了前市委，由郑天祥出面，专门召开了一次前市委常委会，会上是规划局与清华申述自己理由，经郑天祥拍案定案，当时何东昌、吕应中列席了这次会议。

刘仁与清华

一方面旧市委为了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竭力想利用清华，利用 200 号来捞取政治资本，在××方面压过上海。刘仁支持的并不仅是清华，还有其他学校，也想利用他们为旧市委服务。在清华并不止 200 号，其他程控、9003、无线电××等等，刘仁想利用清华的技术力量为旧市委服务，如沙河半导体所是旧市委郑天祥所主管的，清华无线电系就和这个所挂钩。

又如 9003 建成后，刘仁希望清华帮助北京抓精密机械。旧市委还利用其他高校为旧市委的高、大、精、尖服务。

另一方面，因没有和前市委合作，不为北京市委服务，就很有意见的。如清华搞汽热汽车，旧市委就批评清华，说清华有成为“武光第二”的可能（武光为前北航党委第一书记）。又如65年以后清华水利系根据备战原因到×线去搞水坝工程，而没有搞北京的水利工程，旧市委也对清华有意见，赵凡尅了张光斗。

60年，市委给了200号的支持，主要是设备加工和供应了一些材料，并没有投资，而对9003旧市委是直接投资的。又例，60年夏，由于200号与三建有矛盾，旧市委派出一副长，调节结果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

刘仁与参观

62年到65年间，刘仁每年到工地一次，三次吕应中在场，同时还有其他人在。

62年，刘仁走到学校，对高沂、刘冰、何东昌等人说：“人家热时你们要冷一点，人家冷时你们要热一点。”又说：阎锡山说共产党“机会主义”真厉害。（意即指抓住机会，开展白区工作），我看这种机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并说：现在基建力量比较空。后来何东昌陪同刘仁到200号参观，吕应中因病未在厂，这些话何东昌转告给吕应中。

63年，夏季校党委开三堡会议时，党委打电话来工地，说刘仁来厂参观。刘仙洲和吕应中在三堡开会，赶来工地接待。刘仁从昌平来工地，其中一人是刘仁的护士，刘仁这次穿着背心、拖鞋，参观过后，刘仁说：“你们搞得太慢。”问吕应中台湾伪国立清华大学建成了吗？吕答：已投入运转，刘说：你还不如台湾。吕辩解说：他们设备是美国成套供给的，我们每个设备都是要自己设计、加工。刘仁十分不满，没参观完就说：那个黑洞洞不看了。接着就走了。

64年，刘仁等人先到何东昌家里一起来参观。到厂后问建成没有？吕说：还未建成。刘说：不看了。

坐在办公室里和何东昌闲谈，在座的还有梅××等人，谈话内容主要是农村建设方面，还谈到朝鲜的工业建设等。随同来的其他到厂参观的先后一起离厂。来厂途中，刘仁曾问何东昌说：200号前的道路太直，厂房太暴露。何东昌后来转告吕应中，吕应中和搞土建的同志商量了两个方案，后来决定搞了目前的方案。

65年，200号建成后，由何东昌陪同，又来厂参观。并说200号建成了，别

人就无话可说了。参观后何东昌、吕应中与刘仁同车回北京，先到昌平县委吃饭，刘仁要县委在路北多种一些树，使200号和北大隐蔽一些，并顺路到手表厂和半导体研究所参观。

经费关系

200号工程上马，是×部按委托任务拨给投资的。60年由于缩短战线，某部将投资减少，表示不愿再给200号投资。因此200号工程60年以后由高教部投资。这件事蒋南翔约在62年告诉何东昌事情经过。当时张劲夫曾主张200号下马。刘杰也曾对刘仁讲过。刘仁向蒋南翔转达了刘杰的意见，蒋南翔表示：如主要困难是经费问题，高教部自己解决，主张不下马。刘仁表示支持蒋南翔的意见。以后刘杰亦没有表示过反对的意见。蒋南翔找杨秀峰、段洛夫谈了此事，他们表示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上述情况直到1965年在写200号总结时，才知道刘仁支持蒋南翔200号不下马的意见。

地下×××

64年底，我厂初步建成后，吕应中向×部要求任务，×部提出四个题，要吕应中选择，吕选了其中一个任务。

65年2月左右，吕向何汇报，何向吕出谋，何说北京当时要搞地下铁路（据何东昌交代，他自己从59~60年起，他一直在想搞地下×××的念头）。我们可以搞得小一点，又同在地下，又可用在选择的任务上，这样就能有可能得到旧市委的投资和物资支持。何去找刘仁，刘仁同意先研究起来，刘通过何，叫吕应中去找旧市委科委张光斗和国家科委张××汇报，后×部表示没有××，最后没有搞这项任务。以后的1965年上马的××××任务和××××任务与旧市委刘仁无关。

几次接触

第一次 是在57年6月内，何东昌通知吕应中和凌瑞骥与其他十几个总支一级干部，参加过刘仁主持的一次布置反右动员工作的会议。

第二次 在58年8月刘仁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先后找了何东昌、吕应中、凌瑞骥去，刘仁问：“××部对200号投资是否落实，吕汇报了806工程情况。刘仁并询问吕应中有什么新技术，吕写了一份××方案的技术报告。

第三次 吕在60年因病参加工会组织的到北戴河休息十天，清华同去了十几个人，住在北京市教育工会休养所，当时刘仁也在北戴河养病。一天傍晚，通知吕应中去（同去的有刘仁老婆的朋友，一个女医生），询问了广州会议后学校内统战工作的情况，吕应中把党委会上听到的情况做了汇报，约一小时左右，吕应中说：梁××教授等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第四次 65年夏季刘仁拿到76个技术文件，其中一个有关技术物理的绝密文件，刘仁看不懂，叫何东昌带几个懂技术的党支部书记到刘仁住所处，看阅科学院的基础科学规划，主要每个人就所熟悉的项目发表看法，吕对其中一项发表了意见。

第五次 62到65年间，刘仁通过何东昌找到了党总支书记到党委办公室去汇报工作，其中吕去两次。

第六次 62年4月刘在友谊宾馆开市委扩大会，找了吕应中和凌瑞骥谈了有关200号建设问题。

其他

（1）刘仁和总结：

65年3月吕应中在校内介绍科研经验，刘仁秘书张天太曾来了解过，刘仁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通过张天太向何东昌表示，200号经验写好后由市委报中央，后来由于蒋南翔亲自抓，刘仁没有捞到。

200号的总结初稿写成后，刘仁通过党委办公室要了两份。

66年三月旧市委抵制文化大革命，假惺惺地组织了一次毛著积极分子交流会，清华在会上提出合成氨的发言，刘仁并要200号派人出席，报告200号的科研结果，来为其捞取政治资本。

（2）黑帮参观

旧市委、旧中宣部的黑帮分子来200号参观都是由前校党委书记请来的，并

需要经过书记通过才可以的，吕应中还够不上格单独去请的。

如：黑帮分子李琪是由艾鬼请来并陪到200号参观。

五、吕应中与蒋南翔为首的前党委的关系

吕应中是前清华党委的常委，被人看作是蒋南翔的“大红人”，经过几个月的大量调查，我们认为吕应中同志不是蒋南翔的死党，不是前党委的决策人物，在本质上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之流根本不同。他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也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不同程度上执行了刘、邓、蒋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有时站错了队。

（一）吕应中不是蒋南翔的死党，不是旧清华党委中的决策人物：

1. 吕应中很少参加蒋南翔决策清华大事的“书记工作会议”。63年8月到64年8月，共召开书记工作会议36次，吕应中只参加了1次（时间64年1月12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张维等16人，会上吕汇报了试化厂的工作）。64年9月到65年8月，共召开书记工作会议27次，吕应中参加2次（第一次64年11月15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总支书记7人，讨论清理苏联教育思想的问题；第二次65年8月15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高景德等8人，会上吕应中汇报了××任务的进展）。65年9月到66年4月，共召开书记工作会15次，吕应中只参加了2次。（第一次66年2月13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张维等7人，第二次66年4月15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李传信等人）以上情况均可查会议记录。
2. 除“书记工作会”外，蒋南翔有时还召开小型核心会（无正式记录）。根据调查，吕应中只参加了一次这种会，会上吕应中汇报了工作。（66年2月7日，参加者蒋南翔、李传信、邢家鲤、吕应中）。

另外66年5月9日，蒋南翔接见原子能出国考察团时，吕作为团员也被接见，会后蒋与吕谈了一下校内情况，曾谈到让吕回国后抓一下教改工作。

3. 64年北大开始社教之后，蒋南翔之流惊恐万状，曾召开秘密书记会约13次。

（李寿慈参加这些会议，滕藤、张慕津也参加一两次），吕应中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未发现吕应中参加其他什么策划。

4. 在吕参加的常委扩大会上，包括三堡会议上，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攻击三面红旗、

攻击北大社教的言论。（这与蒋南翔、何东昌、艾知生之流形成鲜明对比）。

5. 66年5月11日，吕应中出国考察，没有参与蒋、艾之流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勾当。

6. 目前尚未发现吕应中和蒋南翔有其他进一步不正常的联系，蒋南翔自己供认他用人各有各的用处。他用吕应中主要是为他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向党进攻。

（二）吕应中受蒋南翔蒙蔽，被蒋南翔利用站错了队的几件主要事情

1. 64年底，高教部召开了理工科院校党委记和院长会议，会上有人批判了高教60条，蒋南翔慌了手脚，除了把陆定一、林枫拉来压阵之外，还组织会议参加者参观清华200号。事前蒋南翔通过何东昌向吕应中布置，让吕在讲解中提试化工厂是从“积极方面贯彻60条”的。吕后来在参观讲解时，除了讲200号是大跃进、党的教育方针的产物外，也谈了从“积极方面贯彻60条”，美化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2. 65年底，蒋南翔为了抵制主席批评，稳住高教战线的阵脚，举办了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高沂等人为了突出清华，决定展出清华200号，吕应中同志接到通知后积极筹备展览，客观上帮了蒋南翔的忙。

3. 吕应中根据200号建厂经过，写了建厂的六年总结，后来又在蒋南翔的授意下作了修改，塞进了蒋的私货，为蒋南翔的修正主义路线贴金。

4. 66年吕应中在听到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些指示后，根据240专业的教学情况写了教学小结，提出了一些与原来蒋、何推行的一套不同的办法（今天看仅仅是一些改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蒋南翔用来美化自己，借此标榜清华也是革命的等等。

（三）吕应中对前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做了一些抵制：

吕应中主观上是努力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所以对前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做了一些抵制。当然由于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蒋南翔的修正主义面目。

1. 反对蒋、何历来主张的“以理论为轴心”的教学方法，主张结合生产实际，在“战斗中成长”，曾几次背着何东昌、教务处做了一些教学改革的实验。

2. 反对蒋、何的“天才教育”，反对清华实行的研究生制度。
3. 64年在毛主席号召学大庆之后，吕应中在200号积极领导群众学大庆，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这一年取得两座反应堆一次成功地投入运行的巨大成绩，这与蒋南翔之流在校内的阉割大庆的革命精神，只搞什么“评功摆好”的修正主义的一套成为明显的对照。
4. 吕应中同志反对蒋、何之流主张的“填平补齐”，取消劳动等一些否定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否定教育革命的一些措施。
5. 蒋、何之流在科研中反对搞群众运动和提两条道路的斗争，相反吕应中在200号主张大搞群众运动，主张大抓两条道路斗争，并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

※ ※ ※ ※ ※

虽然吕应中同志不是蒋南翔的死党，但是因为他有“才能”、有干劲、出成果多，加上受到刘邓蒋的毒害，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容易被蒋所蒙蔽、控制和利用，能够比较忠实地执行蒋南翔的一套，所以蒋南翔对吕应中还是重用的，并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扬了他。但是我们考察了吕应中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考察了他在前党委中的作用，和蒋的关系，将他和其他干部做一些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吕应中同志是比较好的领导干部。我们相信他在群众的批判帮助下，能够与刘邓蒋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认为应该让吕应中同志参加到三结合的领导核心中来。

六、北大社教与清华假社教

北大社教工作队于1964年秋进校。北大社教开始。我校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凭借其敏锐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彻底灭亡的命运，十分恐慌。在黑帮头子彭真与旧市委的授意下，密切注视北大社教动态，采取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措施，实行假社教，企图蒙混过关。65年2、3月，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搞翻案，镇压北大社教，蒋南翔积极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校内一小撮走资派感到松了一口气，明目张胆地污蔑、漫骂北大的社教。并继续玩弄假社教的阴谋，企图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是一小撮走资派终于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逃不脱革命人民的法网，在文化革命中宣告了一小撮走资派的灭亡。

下面介绍一下吕应在北大社教与清华假社教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

（一）秘密书记会

1. **刘冰交代材料：**蒋南翔在清华的一次书记工作会上将这个简报（注：指北大社教动态简报）读了一下，……说清华应吸取北大的经验教训，把干部的情况摸一下，把党组织整顿一下。……以后的每次书记会上蒋南翔都有选择给几个副书记宣读北大社教简报，然后讲述他的看法。在当时几个问题上，对北大的估计，对陆平和北大干部队伍的估计，对高等学校搞社教的方针、做法等等，不断阐述他的观点。

2. **何东昌交代材料：**1964年10月至1965年4月，约有十来次书记会，主要是议论北大社教，只有书记参加，没有其他任何人参加。书记高沂去师大参加得少，吕应中未参加过这类会议。

3. **提审何东昌记录：**蒋南翔参加中宣部听张盘石的汇报会，他有北大社教简报，关于北大社教情况，主要来源都是从蒋来的。这十来次书记会大多数是议论北大社教的。

当时对北大社教问题，蒋限得很死，不让外传，开始一两次书记会艾知生也没参加，这倒不是因为蒋不信任艾，而是因为艾的嘴不严，他容易传到团委会那里，团委会又往下传。

4. **提审艾知生记录：**北大社教是64年秋天开始的，最初对北大在党委会上没讲。我参加的会，9、10月份讲得不多。在9、10月份蒋只讲黑话，参加会的，刘、胡、何、高、我、李寿慈。会上没专门讲北大四清的问题。

5. **余兴坤谈：**刘冰，67年8月23日大字报交代黑书记会的问题，我不知道，相信吕应中也不会知道。当然也不能打保票，蒋对这问题很警惕，常委不会去。滕藤可能去几次，因为滕的爱人在北大。

6. **凌瑞骥谈：**开过几次书记秘密会的事，我不知道，是最近才听说。

根据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64年底到65年初，开过十来次的书记会，根据他们掌握的北大社教情况，积极进行策划。吕应中没有参加这一活动。

（二）党委会

1. **刘冰交代材料：**就在这次会议上（指一次秘密书记会）蒋南翔确定要同胡健抓

干部审查，从此清华的假社教就开始了。在以后的书记会上，蒋南翔还提出要加强党内外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决定在同学中、教师、党员干部中开展九评学习，清理思想，他并提出要加强薄弱环节的工作，提出抓土建系、数力系的工作进行整风，这样，清华的假社教就全面开始了。蒋南翔讲的这些精神，我党委会上也讲过几次，当然吕应中在场（是否每次都到场可以查对一下，因为他不是每次党委会都来参加）我没听他讲过什么。

2. 刘冰交代材料：他（指蒋）决定要我分别找总支书记，党委的其他主要负责干部，将他对北大社教的看法，以及他在社教问题上的主张好好谈谈，要这些干部跟上形势，随后我分别找总支书记讲了这些看法，要总支书记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薄弱环节，抓干部审查。我记得我主要找了在校的一部分总支书记谈了，在校内的也没有找完，没有找吕应中，我记得是否准确可以问吕应中。

3. 凌瑞骥谈：这一段时间，清华党委表面上有意回避北大的社教问题，我知道北大社教问题，最早就是陆定一64年10月讲话传达后才知道的，这是64年11月的事。陆定一说北大烂了，起码一半烂了，之后还问了，“你们清华怎样？”

另外，64年10月刘冰还个别找人谈，我、滕藤、X镇（原文不清）关在一起，他说：北大去了工作队，问题很大。……刘冰说：工作队完全是带着框框去的。他问：你们对系里的干部心里有没有数？对北大社教没有讲情况，在总支级干部中，牵进去的只有滕藤，因为他爱人在北大，何东昌要滕藤叫他爱人不要当积极分子。吕应中涉及多少我不知道，65年三堡会，吕应中很少发言。在常委会没有讲过北大社教的具体情况。

（三）三堡会：（1965年）

1. 凌瑞骥谈：三堡会议没有讨论前十条，也没有讨论23条，而是讨论彭真的讲话，谷牧的设计革命总结，高教部党组关于高教社教的意见和大寨社教经验。吕应中在会上强调了200号的经验，强调实验室是三大革命阵地。能解决世界观问题，其他印象不突出。

三堡会议晚上不开，都是刘冰等找几个人谈谈如何将会开好，当时吕应中参加，当时我也参加，在这些小会上，蒋南翔还提出过生产自给，要学大寨等。

2. 余兴坤谈：三堡会议领导核心是书记，吕应中估计不会参加核心。分小组是随便分的，是办公室分的，吕应中有时与我同一个小组。65年三堡会议期间，吕

与我住在同一房间，晚上核心碰头会吕不参加。

3. 凌瑞骥谈：北大社教问题上吕参与不多，因为在第五次三堡会上（主要是反对高校社教）他发言不多，如果参与多的话，至少在65年三堡会上要发言（这个会上滕藤发言多），因为在这次会上攻击北大社教是“合法”的。在三堡会上，他讲的主要是吹200号，讲“实验室也是阶级斗争阵地”，扯北大的不多。

4. 何东昌交代材料：1965年6月前党委三堡工作会议上，讨论顶风及布置65—66年工作，刘冰两次讲再搞一年校内“四清”时，主要是抓支部一级工作，职工工作和薄弱环节。

这次三堡会，吕发言我记得是强调各项工作要有利于学生世界观改造，举了理论课的例子，不可使学生越学越神秘。其他无印象。

5. 周家懋谈：对北大社教，党委常委会讨论过这件事，滕藤的情绪最大，吕的态度不清楚。

6. 提审何东昌记录：正式讨论北大社教的会，是1965年6月下旬，彭真向全市高校负责人做了一个反革命的报告，主要是北大的问题。假借最高指示为陆平“平反”，以后在三堡会上传达了，进行了讨论。当时一般干部主要的认识是北大四清搞错了，对学校工作影响大，伤了元气，党内分裂了，等等。当时在总支书记之间曾谈起过北大四清的一些情况，吕应中当时谈了什么意见，我没有印象。

7. 吕应中交代材料：“蒋黑帮在65年三堡黑会上搞抗拒事情阴谋计划”。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大谈反革命形势；第二部分，假造四清计划；第三部分，布置工作，实现假四清计划。由于篇幅太长，在此不复述，需看者请查审原件。

（四）与其他人接触：

1. 1964年10月前后，前党委决定审干，书记会曾商量过调整几个家庭出身问题比较大的干部。此后，我曾向吕应中谈过要调动××的工作，从党的工作调行政工作，因为她在与××关系上表现不好。我不记得向他透露过北大四清的情况。但可能讲了外面对成分问题比较注意，同时建议×××可否做副书记。以后吕说×××社会关系上也有问题，就搁下了。他好像对此不是很着急的。

1964年暑假前，X人（原文不清），我认为200号政治干部弱，曾向他谈过留一些政治工作干部，成分好一些，他怎么执行的我记不清了。

1964年11月，蒋说北大技术物理系放射性事故，工作队上纲为阶级报

复。……我曾布置过检查（按：指安全工作），我不记得向吕应中布置了没有？

（以上均为何东昌交代）

2. 1965年2、3月份中央书记处邓小平讲：“北大工作队一进校就要把陆平打成坏人，是违背党的方针的。”这以前，书记会，蒋关照过不得向下透露。以后认为北大形势“明朗”了，就比较随便。（何东昌交代）

65年4至5月一次党委常委会之前，何东昌与身旁的总支书记谈话，说北大总支书记上台说自己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看他们怎么下台，又说阮明找过他，跟着跑，又犯了错误。（吕应中谈）。

3. 65年，6月26日到刘仁家去看过技术资料，当时在三堡开会，由何东昌、吕应中、余兴坤、滕藤和我五人去，去时科技大党委书记刘达也在。我们当时一人分了一批材料看。刘仁就与何东昌、刘达谈通县会战情况和攻击北大四清，刘仁说：“陆平当时给斗得受不了了，就找我，我在电话里告诉他，陆平吓得不得了，说：‘现在千万可别来。’我就同意他来市委找我。他对我说他要全承认了，我说，你想通了就承认，想不通的不要瞎承认，现在胡说，将来我们想帮你也帮不上。”等等。我们一面看资料，一面听到这些，后来刘仁就问我们对这批技术资料的意见，我们各自谈完了自己的意见就回来了。（凌瑞骥谈）

1965年6月，刘仁通过党办通知我带滕藤、凌瑞骥、吕应中、余兴坤，陆大金等几个新系的党总支书记去看科研资料——国家科委的远期规划。科技大书记刘达也在场。刘仁讲过，他在北大四清开始时要去北大找陆平，陆平不敢，要求到市委。陆平去了，刘仁给他打招呼，意思是不能瞎承认。刘仁还问过我，阮明的成分，并说查1954年前大学毕业生的成分是没有常识，“还有好的！？”意思是北大四清搞“唯成分论”等等。我记得总支书记都没有插话。（何东昌）

4. 65年下半年，许立群到工地参观，同车回校，艾知生来陪同，艾知生问许立群：“北大情况怎么样？”许答：“北大是擦屁股没个完。”（按：许当时是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吕应中）

四、吕应中贯彻假社教的情节

1. 为了帮助大家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把刘冰交代的清华假社教的主要言行整理如下：

(1) 了解了北大工作队抓党内不纯问题，要清华党委整顿党组织，审干，由刘冰，胡健来抓。

(2) 认为北大不是资产阶级大学，贯彻的不是资产阶级路线，陆平不是资产阶级及代理人。(3) 大反“唯成分论”。

(4) 反对控诉会形式，主张和风细雨搞整风。

(5) 反对高等学校派工作组，主张自己搞社教，“自觉革命”，主张社教落实于教改。

(6) 学生、教师、党员干部清理思想。

(7) 抓薄弱环节，加强这个环节。

2. 吕应中在 200 号贯彻情况（略）。

七、关于吕应中参加黑帮核心组会的初步调查

有关吕应中是否加入党委书记小核心组，参加决策问题，我们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核实，由于党委书记一级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因此我们所搞到的材料只是初步的，可供以后进一步深入调查时作为参考。

（一）据吕应中自己交代，吕参加小核心组会的次数和内容：

第一次：66年初，是一个晚上，在蒋家中，参加人李传信、艾知生、邢家鲤，会议主要内容，蒋说的：（1）批评教务处不团结，要大家支持教务处的工作；（2）蒋大讲过去清华党内斗争史，提到何东昌在袁永熙向党进攻时，何也不清楚。

第二次：66年4月初一个上午，在蒋家中，参加人：刘冰、艾知生、李传信。会议主要内容：看江青报告，传阅着看，蒋说的主要内容：1、工科也要关心学术批判，济南会议对此未重视，不对。2、目前要批判吴晗，但也要准备点本单位的東西，如钱伟长可拿出来批判。3、说到刘仙洲与他的意见不合，是清华目前前进的障碍，刘仙洲要出版校史，其中还有吹捧吴晗，说以后少让刘参加常委会。

第三次：66年4月15日，上午，蒋家，参加人：刘冰、胡健、李传信、周家愨、艾知生（后进去）会议主要内容：1、蒋说：要批判三家村，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最近要见报。2、蒋说：前市委为此已开了一个多月的会，邓拓正在检查，邓还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助，我当然不能说什么，邓的事何时见报，就看彭

舍不得下手了，这是彭周围的人。3、三破三立。破吴晗、钱伟长、胡华。立200号、712、合成氨。4、给吕任务修改总结送红旗发表。

（二）有关吕应中参加小核心组会（包括书记工作会）的调查与核实：

我们所掌握的一部分材料（书记工作会议纪要）是63年8月以后的，因此在这以前的情况就不太清楚，而掌握的这一部分材料也不完全，有很多小书记会是不让记录，参加人数更少，因此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现将63年8月以来吕应中所参加的书记工作会议和小核心组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的内容整理如下：

1. 1964年1月12日，晚，甲所会议厅

出席：蒋、刘、高、何、胡、艾、张维、赵访熊、李恩元、何介人、吕应中、汪家鼎、钟士模、凌瑞骥、房家国、王和祥、李庆和、朱成功、徐一新、裴全。

议题：（1）试验化工厂工作汇报；（2）911项目工作情况汇报。

2. 1964年11月15日，晚，十公寓

出席：蒋、刘、高、胡（早退）、李寿慈、何东昌、艾知生、李恩元、吕应中（早退）、滕藤、何介人、邢家鲤、蒋企英、陈圣信。

议题：教师清理苏联教育影响问题。会议讨论了关于试验化工厂建设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草稿，再做些修改后定稿。

3. 1965年8月15日，晚，十公寓

出席：蒋、刘、何、胡、李恩元、高景德、吕应中（早退）、滕藤（早退）、张永良（早退）、张光斗（早退）、邢家鲤、郝根祥。

议题：（1）水利、工化、09项目。（2）校医院李岩、水利系学生反党集团处分问题，吕应中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

4. 1966年2月7日，下午，蒋家

出席：蒋、李传信、邢家鲤、吕应中。会议内容调查如下：

A 李传信交代：（1）吕应中汇报×××，蒋说：“可以浪漫主义的设想一下，要使这个项目影响到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蒋要吕在200号搞小型展览，以接待中央负责同志，最好在5月左右。（2）蒋批评邢家鲤，要他支持艾知生的工作。（3）蒋大讲了清华党内生活斗争的历史，要求加强党委内的团结。

B、邢家鲤回忆：（1）吕应中汇报×××任务，蒋要吕快些，能对将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有所影响。（2）邢不记得蒋说过清华的党内斗争史。

C、根据吕允文、曹焕林、施家佩的工作笔记本上记载：吕应中在2月7日晚总支扩大会议上讲，那天下午去蒋家汇报×××的工作，蒋要求加快些，争取五一搞个展览。

5. 1966年2月13日，晚，强斋二楼会议室

出席：蒋、胡、艾、张维、李传信、吕应中、高景德、邢家鲤、郝根祥、饶慰慈。

议题：（1）各总支讨论毕业设计情况汇报。

（2）×××的研究室计划（注：200号的研究项目）。

6. 1966年4月15日，上午，蒋家

出席：蒋、刘、胡、艾、李传信、吕应中。

议题：学术批判问题。

会议的内容调查如下：

A 艾知生交代：

（1）传阅看文件，有关批判邓拓、吴晗，还有一个彭真、范瑾的讲话。

（2）艾传达李琦在大学部的讲话。

（3）蒋提出要跟上形势参加战斗，有些动作要快，另外提出批判钱伟长，即所谓三破三立，破吴晗、钱伟长、胡华。立200号、712、合成氨。

（4）蒋提出撤销党史编委会，党史上有吹捧吴晗。

B 胡健交代：

（1）蒋拿了江青报告念了一些。

（2）周家愨开完大学部会后，传达了会议的情况。

C 李传信交代：

（1）传阅看江青报告和有关邓拓的检查。

（2）蒋要李传信抓批判钱伟长的问题

D 周家愨回忆：

主要是三破三立。

E 周家愨整理的书记工作会议纪要原文：

会议明确：（实际上记的都是蒋一人的发言）

（1）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正进行反右斗争，比之1957年政治上的反右斗争，更深入了一步。党内对于当前这一形式要充分认识，有些干部往往容易强调业务，犯职业病。我们虽然主要时间是搞业务，但是一定要政治第一，眼光看得远一些，关心整个教育、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要注意师生的思想动向，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战斗，校刊学报都要配合，既要破旧，又要立新。

①破旧就是要批判。今后政治课教研组要组织几个战斗小组，专门经常阅读、研究、发表有关的文章，一个月左右向党委汇报一次。当前首先参加批判吴晗的问题。由艾知生负责，可以结合校史研究进行，校史一定不要出版。要清理检查一下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问题，应该进行自我批判。

其次是对钱伟长的批判。过去写的文章，在业务上着眼多一些，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再整理研究一下，深入一步，准备提供一个理工科方面的典型，要主动抓好。请李传信同志负责，暑假前搞出来。

第三是参加帮助批判胡华为陈独秀翻案问题。

②立新就是要总结实际斗争经验，比较站得住。不要写抽象的哲学论文。今后每年都要写出两三篇有分量的总结文章。经验总结不能只写工作过程，要提高思想性。×××的经验总结是个萌芽，可以再改一下，登红旗杂志，五月写妥。712项目要动手总结一下，由滕腾、李传信、吕应中、汪家鼎等同志负责，上半年定稿。合成氨、塔报道的文章还要进一步加工提高。

（2）校史编委会改为校史工作小组，归入党史教研组，学报编委会要改组，事先在党内外酝酿一下，由高景德同志提出改组意见。

（3）科学研究、毕业设计工作，既要有群众性的高产、校产、X产（原文不清），又要明确一号高地是×的利用研究，意义比较重大。要集中全校力量，密切配合，争取三年过关，打歼灭战，200号可以考虑成立研究所××××员编制。

按：这是200号团派同志整理的材料，材料来源于工作组时期的揭发材料及吕应中的交代材料。现翻印出来，供大家在讨论吕应中问题时做参考。

八、吕应中对待毛泽东思想言论

编者按：为了在 200 号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 200 号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因此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必须进行彻底批判。以下是我们整理关于吕应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这些材料来源是依据去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厂革命群众和干部揭发，以及吕应中本人的交代材料。希望全厂革命同志核对、更正、补充之。最后说明：材料仅供大家参考。（《1042》战斗组）

一

1. “高等学校和农村不一样，不适宜搞四清，因为高等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没有夺权问题。校长有问题可以撤换，另派一个来。若党委书记有问题就更好办，召开党员大会大伙不选他就是了。所以中央决定高等学校不搞四清。学校知识分子思想问题比较复杂，去参加农、工厂的四清受教育，提高觉悟。”——张静揭发。

2. “学校的条件很好，没有复杂的阶级斗争，校党委领导正确，没有夺权斗争问题。”——1965年12月12日，吕应中答101、102一些同学。

“学校中不存在夺权问题。”——曹焕林揭发。

3. “四清不是万能的，你们不要迷信，马克思没有搞过四清，不也是革命家。”（当时留下一批教师、同学没有去参加四清）后还说：“我们还是太积极了，应该全不去！”——王大中揭发。

4. 为了阻挠教师、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吕应中提出：“实验室工作也是搞阶级斗争”，“搞科研就是参加阶级斗争，不一定非到农村或工厂去。”“实验室里能够培养三大革命运动战士。”——张静、林家桂揭发。

5. 65年2月16日，全厂干部会上动员全年工作时只提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事物，只讲战略、战术、三结合等，不讲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不讲人的革命化。——吕允文 66.9.22 揭发。

6. “毛主席的思想说来说去就是一条：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干，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彻底的群众路线。”“200号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特点不是先学了哪一条指示去用，而是干完了一总结，便发现其中符合主席著作的某几条。”——梅启智揭发。

7. 66年初，在主厂305一次碰头会上，吕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表面，搞形式主义。有的单位工作时光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实际上也不做。”“我们这里工作，从来不是先看毛选，而是先去工作，做出成绩来再总结提高，去看符合毛主席著作里哪一条。——潘雷鹏揭发。

二

8. 65年9月，吕在给××任务上马做动员报告时说：“完成任务的关键：创造性地完成生产任务就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马列主义，否则，则不是。”

9. “会会用，哪有每个会要研究的问题主席都说到了的！最多像三查开始学一学勤俭建国，不要那样形式主义！”——吕允文揭发。

10. 66年初，在一次总支委员会上，吕说：“毛主席著作学习不要形式主义，115每个礼拜要学几次，这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并布置×××去纠正。

——潘雷鹏揭发。

11. 64年4月底吕在审查团总支64年全年工作重点和四好团支部标准中，当谈到草稿中提出要团员天天学主席著作并记笔记时，吕说：“不要搞这些形式主义”，让把这一条去掉。后把“天天学”改为“周周学”。就是这样，他仍不满意，一再强调团总支宣布去掉这一条。——梅启智揭发。

12. 66年初，吕在总支扩大会议上说：“对于教师来说，当前的矛盾不是学，大家对主席著作差不多都看过了，关键在于抓住一句两句用，用好了干出成绩来了，也就是主席思想学好了。”——梅启智揭发。

13. 吕认为学习老三篇低级，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学“本本”，主要是掌握本单位的客观规律。——林家桂揭发。

14. 工程建成后，吕在起草蒋南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厂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指导建厂工作。实际上吕没有组织干部学习与讨论过《矛盾论》和《实践论》，也没有看到他自己学过毛选，总是看见他抱了一本洋书。——林家桂揭发。

15. 吕应中认为“对毛主席著作不在于学多少，重要在用，只要出了成果，就有主席思想。”吕应中一贯是先出成果，再套用主席思想。他在《教改总结》中写道：“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又写道：“我们在实践中反复地学习

了毛主席的以下论点：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纯粹是撒谎。——王大忠 66. 7. 25 揭发。

16. “大庆的五个一条线，床头放毛选是形式主义，不用学。”

17. 宣传组要在主厂前树毛主席语录牌，吕不让树。×××与吕商量后传话说“不要搞形式主义！”可是暖通设计室、主厂 213、234 室却挂着吕应中的“四个十分”。——王志宣揭发。

18. “政治工作落实到过硬功夫上。”——乌致祥、王明宗揭发。

64年10月26日吕应中讲：“政治要挂帅到业务上去，突出政治过后，就要在业务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65年12月在总结报告中说：“如果不抓政治就搞不出什么东西，所以就必须抓政治。打政治仗本身，又不能脱离当前的具体任务。——物 607 丘仁森等 7 人。

19. 64年11月，吕在讲到思想改造问题时说：“有人总相信教条本本（显然吕这里是指毛主席著作）……其实思想改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实践……”——王大中揭发。

20. “知识分子学完四卷有什么了不得的，很容易做到的事。”——吕允文揭发。

21. “《如何打乒乓球》一文，全篇是马列主义。但没有引用主席一句话，水平高……。我们写的总结水平不高，还引用了主席的话。”——王大中揭发。

三

22. 1965年8至9月间，团总支准备召开一次学习老三篇交流会，在向吕应中汇报时，他不耐烦地打断汇报，不让再继续再谈，并说：“难道200号学毛选的水平就是这么低级吗？”于是让团总支去收集几个谈如何掌握本单位工作规律性的材料，已准备好的一次学习老三篇交流会就这样被他制止了。——梅启智揭发。

23. 在干部会和全厂大会上多次说：“老三篇学习适合工农兵，知识分子要摸规律，提高些，深刻些。”——潘雷鹏揭发。

24. 吕在干部会上说：“张百发队学习《纪念白求恩》学了两个月，搞得很紧张，有的工人就发牢骚说：”老白呀！老白！你干嘛那么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叫我们天天学，你害得我们好苦哇！——张静、梅启智、吕允文揭发。

25. 一次吕在给全厂职工讲党课时说：“一个中学有两个团干部，外出为学生找游

泳场地，结果找到一个水坑，不知道水坑有多深。两个人都不会游泳，其中一个团委书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去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于是这个团委书记就脱了衣服往坑里跳，结果淹死了。这是死学死用，学死用死。”——张静、胡大X揭发（原文不清）。

26. 多次贩卖邓拓的黑话：“知识分子学毛选有三个特点：一学就会，一放就忘，一用就错。”——梅启智等揭发。

27. 吕宣扬打乒乓球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说“打胜了，是用毛泽东思想，打败了又怎么说呢？”——胡大X（原文不清）揭发。

28. “××所学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方案上要伸手到100多度的蒸汽中取××，这是不动脑子。”——潘雷鹏揭发。

29. 去×××所参观，吕看到这些单位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他说：“这些实验室挂毛主席语录是形式主义，是做给人看的。”——潘雷鹏揭发。

30. 64年9月吕在给物607、707同学做九评学习动员报告时说：“蒋介石和毛主席主观上都想改造客观世界，然而由于蒋介石违背客观。终于失败了。”——物707黄衍禧等6人揭发。

31. “我觉得主席思想不完全，在科研中很多主席没讲，要从实践出发，要发展。”（吕应中66年7月16日交代）“我厂一切革命工作都是毛主席思想的具体化，也便是发展着毛主席思想。”“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不想承认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早在63、64年已暴露出来了。”——吕应中交代材料。

32. 64年12月给物607同学做“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报告时说：“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那么我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也是整天实践。”——物607王仁森。

33. 吕多次散布彭真的黑话：“活学活用主席思想，彭真说就是在各自的领域内寻找工作的规律性。”——潘雷鹏揭发。

34. 64年6月。吕传达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时说：“这儿没有业务上的要求”，65年说：“现在看来，在培养班人的问题上，我们摸索了一些门路，这就是战斗中成长。”——王大中揭发。

35. 64年底，吕提出“科学拜物教”，他说：“马克思提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我想了半天，科学上也有宗教。”——王大中揭发。

36. 66年底在劳改时说：“别光看大标语写的多不多，会上念念语录，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少了，生产又回到苏联那一套保守方案上去了，我说毛泽东思想少了。”——梅启智揭发。

吕作报告不是大力宣传最高指示，而是大量散布他的“四个十分”，“一为三不怕”，“一为三不做”，“一为三彻底”。给200号同志做学习焦裕禄的报告也是大讲他的“一为三彻底”。——林家桂揭发。

65年9月13日在讲备战问题的大会上也是大讲“寻难而进”，“四个十分”。——物607王仁森等7人。

四

37. “部队工作比较简单，任务单纯，对象也简单，所以政治工作好做，而学校任务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思想也复杂，解放军的一套办法在学校不一定行得通，不能生搬硬套。”——张静揭发。

38. 66年初在一次党总支委员及支部书记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希望总支讨论我厂怎么开展向解放军学习问题。觉得我厂在这方面搞得冷冷清清。吕应中说：“你们还不懂得200号的特点，不要跟别人学样子，搞表面轰轰烈烈。”——梅启智揭发。

39. “解放军性质单纯，搞语录可以解决问题，知识分子复杂，搞语录是形式主义。”——吕应中交代。

“知识分子和解放军不一样，解放军战士文化低，水平差，总是讲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这样太简单，我们要提高，着重在工作中寻找规律性。”——115战斗队。

40. “校外学雷封（注），有形式主义。”“有小学生上学，带着扫帚扫街，把上学都耽误了。”——吕交代材料。📄

注：“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全国人人皆知，家喻户晓，而吕在66年7、8月份的检查中，却把雷锋都写成了雷封！

—— 完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